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伟大的空想家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 伟大的空想家

## 陌生的外国人

没边没沿儿、不切实际地空想，也能成为“家”，而且还叫做什么“伟大的空想家”，听起来，真有些新鲜！可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过空想家。不过，我们的读者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他们都不学无术，只是成天坐在屋里胡思乱想；其实，他们大多是些有学问、有理想、有道德的人。

这些空想家对于我们说来，是十分陌生的。他们全是外国人，生活的时代离我们也相当久远了，远的有四百多年，最近的也有一百多年。有些读者恐怕还是生平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名字。然而，就是这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空想家，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关系呢！

我们现在都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好》的歌子，连咿呀学语的娃娃也会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中学生，谁都能说上几句。如果问起社会主义是谁提出来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会一口答道：“马克思，还有恩格斯！”

这回答当然不算错，可是不大准确。严格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最初的社会主义思想，却是由那些空想家提出来的。要知道，社会主义这条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并没有现成地摆在人们面前；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下子就想出来的。人们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过了三四百年的漫长岁月。从十六世纪初开始，一些空想家就提出要建立一个铲除贫困和无知、消灭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给受苦受难的无产者和全人类带来光明和幸福。他们写了不少书，描绘出未来社会的一幅幅美妙的图景，设想着改造现存社会的一个个详尽的方案。

可是，空想家对未来社会的美妙设想，有许多是带有猜测的成分，缺少科学的根据；就是说，他们说不清，未来世界为什么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他们也不懂得，怎样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所以，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新社会的种种设想，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家当中，最有名的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和他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换句话说，虽然空想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虚幻的、空想的，可正是有了他们走出的这第一步，才有了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么说来，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但应该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应该感谢那些空想家呢！

因此，我们不仅要感谢那些空想家，而且更应该了解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千百年来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他们追求真理、献身事业的精神，曾经鼓舞了后来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丰富的思想曾经启发了早期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也仍然能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和教育。

那么，就让历史老人带领我们，回到三四百年前，去认识认识那些伟大的空想家，到他们的“理想国”里去漫游一番，并且了解一下他们那些各不相同的动人经历吧。

《乌托邦》的由来

万事开头难。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进步事业的开创，都是极不容易的；而那些开创者也的确都是些很了不起的人物。

世界上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就称得上是这样一位开创者。

莫尔得了这么个了不起的称号，他一定做了些很了不起的事吧？

做是做了，不过听起来似乎也很平常，他只是写了一本名叫《乌托邦》的小说。

“乌托邦”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乌(ou)”是没有的意思，“托邦斯(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没有的地方”。“乌托邦”这三个汉字，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在一八九八年译成中文的。这个译名在发音上和希腊文相似，在意思上表达得也很巧妙、准确：中文的“乌”恰好也当“没有”讲，“托”是“假托”，“邦”是国家，“乌托邦”就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国！

一个没有的地方，一个理想的国家，这书名就先给人一种神奇的、虚无缥缈的感觉。我们的读者一听，可能就想找本《乌托邦》看看，说不定还会给它吸引住呢！要知道，这是一本有趣的游记，生动地记叙了一个葡萄牙旅行者在奇异岛国——乌托邦的所见所闻。

不过，你读着读着，就会发现，《乌托邦》和那些专讲海外奇闻、天下趣事的游记不同。书的全名就别具一格，叫做《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书中所描写的乌托邦人的生活，有些虽说很是新奇，有些却是我们相当熟悉的。

在美丽的乌托邦岛上，有一座庄严宏伟的城市。城里条条街道宽阔清洁，家家房屋漂亮整齐，每家还都有一个花园。岛上到处树木葱绿，枝头果实累累，宛如桃源仙境一般。

这些漂亮住宅，都是国家分配给居民的住房，没有一所是私人的。在岛上，不只是房屋，还有土地、手工作坊和其他一切财产全都属于国家。一句话，那里实行的是一种财产公有的制度。乌托邦人认为，要是允许人们去拼命捞钱，把社会的财富占为己有，总有一天，少数人会发财致富，多数人将贫困不堪。因此，一定得废除私有制度，建立公有制，才能使人人幸福。为了杜绝私有观念，他们甚至规定，国家分配给各家的住房，每十年都要调换一次！

乌托邦岛上真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因为在那里，既没有游手好闲的懒汉，也没有不劳而获的盗贼；人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有的炼铁，有的纺织，有的当木工，有的作泥水匠。岛上没有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大家轮流去农田干活。每天，人们只工作六个小时，其余时间就用来学习，参加学术讨论和文娱活动。岛上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且享受免费医疗。

乌托邦人把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送到公共仓库，再从那里领回需要的一切，很有些“按需分配”的意思。这样一来，买东西的钱也变得完全没用了；世人认为最值钱的金子，在乌托邦成了最被人鄙视的东西。人们只用黄金来制作“公家厅馆和私人住宅里的便桶”。要不，就用它们来做“奴隶身上的长链大铐”，或者罪人耳朵上挂着的金圈、手上戴着的戒指、颈上系着的金链和头上套着的金箍。

有的读者看到这儿，也许要纳闷，为啥要给莫尔那么高的评价？《乌

托邦》里，不就是讲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劳动，产品归公，按需分配的公有制的社会吗？如果要问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兴许还能说得更准确、更详细些呢！而且，我们还能指出莫尔空想的地方：如果乌托邦只有手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哪里会来得很丰富的产品，而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这样，还得用钱去买东西，金子怎么会变得一钱不值呢？

这些想法都不错。当年，莫尔对于公有制社会的设想，可能远远赶不上现在一个中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水平呢！可是，请不要忘记，莫尔是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人，那时候的英国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完全是两个时代呀！

莫尔描绘的未来世界，确实有不少空想的东西，他也不曾把自己理想的社会叫作社会主义。可是，他毕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并且坚信它必然会实现。所以，后人把莫尔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乌托邦”也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了。

### “羊吃人”的奇闻

四百多年的岁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不管让谁设想一下，几百年后的世界是啥模样，并且真能说得出和事实相差不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吧？

想想吧，四百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明朝中期。我们熟悉的清宫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还有大药物学家李时珍都是那会儿的有名人物。很难想象，这些满口之乎也者的封建人物，能预见到什么公有制的社会。

可是，四百多年前的莫尔为什么能写出一本《乌托邦》，猜测到未来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形呢？当时，英国不也是个封建国家吗？

是的，那会儿，英国表面上还是国王、地主占有土地，让农民干活儿，养活他们。可实际上，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最初的资本家，他们雇佣工人去开矿、造船、织布、纺羊毛，再把生产出来的煤呀、矿石呀、布匹呀、呢绒呀，卖出去赚钱。那时候，最赚钱的是呢绒；因为英国的有钱人，还有欧洲许多国家的王公贵族，都喜欢用英国产的呢绒。毛纺业发展了，生产出又多又好、受人欢迎的呢绒，也算得上社会生产的一个进步。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个进步却给英国无数的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甚至出现了“羊吃人”的惨剧。

听起来，“羊吃人”比童话还要神奇。从来没有哪篇童话，把温良、驯服的小羊儿说成是吃人凶兽。然而，人们脑子里想象不出的事儿，在现实生活中，却真的发生了。事情还要从呢绒畅销说起。呢绒是羊毛做的，呢绒一畅销，羊毛自然身价十倍。那些见钱眼开的贵族地主，哪肯放过这发财的机会，于是纷纷把耕地改成牧场，养起羊来。要知道，十英亩牧场的收入比二十英亩耕地的收入还要多呀！

这样一来，羊儿交了好运，贵族地主发了横财，资本家的呢绒生意越做越兴隆，农民却被逼上了绝路。

贵族地主把佃农从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田地上赶走，把大片土地用栅栏圈起来，把正在生长的庄稼统统毁掉，种上密密麻麻的牧草。他们这样做还嫌不够，为了不让佃农有立足之地，他们竟心毒手辣地把一座

座村庄，甚至许多城镇也给毁掉了。从前肥沃的耕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原，昔日宁静的农舍上空再也看不见袅袅的炊烟。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带来的悲惨后果。

那些失去土地的佃农，不得不变卖了全部家当，离开自己的家乡，拖家带小，四处流浪。他们一窝蜂地涌入城市，在花完身上最后一文钱的时候，要么饿死道旁，要么去沿街乞讨；夜晚只得栖身在富人的屋檐下。

当时的英国国王叫亨利七世，他看到城市被逃难的农民搅得乱糟糟的，说不定啥时候要闹出大乱子；也担心流浪汉越来越多，谁来给他当兵纳税呢？于是，他制定了一条惩治流浪汉的法律。亨利七世死后，他的儿子亨利八世继位，把这条法律变得更加残酷无情：凡是未经许可，流入城市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被打得遍体鳞伤，直至流血，然后押回老家；如果再被抓到，除了挨鞭子，还要割去半只耳朵；等到第三次抓住，立即送上绞架，决不轻饶。这样，亨利八世在位期间，被当作“盗贼”处死的流浪汉就有七万多人。

可怜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留在家乡得活活饿死；种惯了地的庄稼人，出外也很难找到别的活干；沿街乞讨，又要被关入监牢；如果铤而走险，去偷窃、抢劫，等待他们的将是绞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就在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非命的时候，成千上万只羊儿却在牧场上、羊圈里欢蹦乱跳哩！这不就是因为它们走了运，农民们才送了命吗？当然，说到底，吃人的不是羊，而是那些靠卖羊毛，靠生产呢绒发财致富的贵族和资本家啊！

“一面穷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羊吃人”的时代，莫尔写出了一本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乌托邦》。大概，一个勤于思索的人，越是生活在黑暗的社会里，就越是向往光明的未来。莫尔对于“羊吃人”的罪恶是深恶痛绝的。他在《乌托邦》里，不但描述了美好的未来，而且真实地记叙了英国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的痛苦，一针见血地指出：“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羊吃人”这个英国资本主义发家的秘密，就是由莫尔第一个揭露出来的！

## 大法官上了断头台

莫尔痛恨“羊吃人”的罪恶，他看出私有制是穷人贫困和不幸的根源。他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平等、公有的新社会，才能使人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四百年前的英国，莫尔能够认识到这些，并且写出来公诸于众，该有多大的勇气和智慧啊！他并非不知道，对无辜农民动不动就滥施酷刑的国王，是不会饶恕那些明目张胆攻击他们统治的人的。为了使人们了解自己的思想，莫尔真费了一番苦心！

莫尔生活的那会儿，正是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时期，第一个到达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环球航行的麦哲伦都是和莫尔同时代的人。探险者发现

的新地方，引得许多人心驰神往。有人想到海外找黄金、寻珍宝，有人也许只是好奇心盛；一时间，介绍海外风土人情的小说和文章被人争相传看。莫尔也就抓住读者的这种心理，把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写成了一本游记小说，还起了那么一个神秘的名字。他还在书中表白，说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都是听人家讲的，他自己并不赞成那个社会。他痛斥“羊吃人”的罪恶，也没敢写出英国二字，只是说那事情发生在一个“奇怪的国家”。

正是依靠这种隐晦曲折的手法，在一五一六年《乌托邦》刚一问世，就轰动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时候，莫尔不仅没有受到迫害，反而在国内外都出了名！

读者们也许又要问了，莫尔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能写本书，还能拿去出版，恐怕不会是个默默无闻的穷人吧？如果莫尔是个富人，他为什么要反对使富人享福、穷人受苦的私有制呢？

说起来，莫尔不但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而且还是个当官的。他出生在伦敦一个富人的家庭；做过律师，当过国会议员，下议院议长，最后做到大法官。

不过，莫尔和别的当官儿的，有钱的不大一样。

他当律师一不徇私，二不贪财。受欺负的穷人求他帮忙打官司，他宁可少拿钱，也要为他们说话；对有钱有势的富人，莫尔从来不巴结讨好。所以，老百姓都很爱戴他。

他做国会议员的时候，甚至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敢同国王顶撞。有一次，英王亨利七世借口为公主结婚和皇太子晋爵，要求国会给他一笔特别补助费。那会儿，皇太子早已死了两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晋爵？莫尔认为英王这样向国会勒索巨款，就是在榨取人民的血汗，坚决表示反对。结果国会削减了这笔补助。事后，亨利七世的御臣们愤愤地说：“国王的全盘计划都被这个没长胡子的男孩子打乱了。”亨利七世“龙颜”扫地，自然对莫尔怀恨在心。

亨利七世死后，亨利八世上台，他表面上很赏识莫尔的才干，一再提拔重用他，最后，让他做的大法官，是英国当时最高的官职了。国王还经常约莫尔和他一块儿吃午饭，不拘礼节地和他谈天说地。可莫尔心里清楚，国王只不过是要拉拢他。一天，亨利八世亲自登门看望莫尔，一见面就亲切地和他拥抱，还一同去花园散步。国王走后，莫尔对他的女婿说：“别看英王这样厚待我，如果用我的头能换来法国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我！”莫尔明白，他自己决不会对国王唯命是从，而国王对一个虽有本事，却不听话的大臣，也决不会刀下留情。

果然，莫尔和亨利八世后来就不断发生冲突。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莫尔甚至辞去了大法官的职务。亨利八世看出莫尔终究不会听他摆布，就决心除掉他。

一五三三年，亨利八世要全国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在内，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拒绝宣誓。亨利八世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下令把莫尔关进了阴森可怕的监狱——伦敦塔。一年后，法庭以莫尔须有的“叛国罪”将莫尔判处了死刑。

一五三五年七月的一天，莫尔被刽子手押到刑场。他还打算向周围

的群众再讲几句话，却遭到禁止。于是，他和亲友们一一告别，然后自己用头巾把眼睛蒙住，回过头来对刽子手戏弄地说：“我的脖子不长，你们可要仔细看准，免得当众出丑。”

世界上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先进的思想，只有进步的人才能说出，闪光的真理，只有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能得到。看看莫尔的所作所为，他能写出《乌托邦》，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描绘出一个公有制的乌托邦，是并不奇怪的。

### 学识渊博的小僧侣

莫尔名叫托马斯，莫尔是他的姓。莫尔死后五六十年，在意大利出了一位和他同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康帕内拉。康帕内拉也写了一本有趣的小说，叫《太阳城》，和《乌托邦》同样有名。

说来也奇怪，为什么两个托马斯，都能把未来世界描绘得形象逼真，令人神往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吗？当然不是。历史上的空想家，大多是些很好学、很有知识的人，他们对千百年来人类积累的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并且竭力用自己的头脑去鉴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从中探求人间的真理。所以说，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并不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康帕内拉也是个学识渊博、追求真理的人。

康帕内拉从小十分喜爱文学，十三岁就能作诗。可他父亲是个穷鞋匠，没钱送他上学。后来，因家中日子越来越难过，不满十五岁的康帕内拉被送进了修道院。

修道院是天主教培训神父的学院。康帕内拉却把那儿当成了学习的好地方。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倒不是想做个虔诚的僧侣，而是要从书中寻找真理。康帕内拉读的书真多啊，有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的哲学著作，还有天文学家哥白尼和伽利略写的书。（伽利略和康帕内拉是同时代的人。伽利略受天主教会的迫害，康帕内拉还为他辩护过呢！）康帕内拉曾经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我整个身体在一小把髓中，——可是  
我贪婪地阅读的书  
却多得全世界也装不下。  
我的贪得无厌的胃口是填不饱的，  
老是感到饿得要命。

康帕内拉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学问。有人问他怎么会这样长进，他风趣地回答：“成功的诀窍很简单，那就是既不要吝惜精力，也不要吝惜蜡烛。”康帕内拉确实常常借着昏暗的烛光读书，直到天明。修道院发的蜡烛本来是供一个月用的，可他不到一个星期就点光了，常常不得不请求院里再发一些给他。

一五八五年，康帕内拉的老师，派他去科森萨市参加天主教会举行

的一次哲学辩论会。他在会上，初次显露了自己的博学。

康帕内拉风尘仆仆赶到会场的时候，听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人们好奇地望着这位面颊清瘦，两脚溅满泥巴的少年。看上去他只有十六七岁，举止稳重却像个成年人。他不慌不忙地在青草上擦了擦脚，穿上草鞋，从容地走进教堂。

“难道这个小孩子是来参加辩论会的吗？”会场上骚动起来。只见康帕内拉向会议的主持人深施一礼，说了声对不住，因为老师得了急病，只好临时改派他来参加辩论。他的话音未落，就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没有能人，就别参加辩论，怎么能打发个“刚从圣水盘里抱出来的婴儿”来和有学问的人较量？

辩论会就在这一片喧闹声中开场了，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真理的标准？”

康帕内拉的对手是个中年教士。他搬弄着名人权威的话语，引经据典地讲开了。瞧他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用不了三言两语，就能把眼前这个黄毛小子弄得无言可对，甘拜下风。没想到，轮到康帕内拉发言，他竟是那样镇静自若。他先把对方的论点一一列举出来，然后用圣经上的话和古希腊哲学家的名言逐条加以驳斥。一时间，听众被康帕内拉雄辩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惊呆了。

那位中年教士也有些坐不住了，他死盯着康帕内拉，竖起耳朵，想从对方话里找出破绽。

康帕内拉继续说着：“不要以为什么东西只有教父（古代神学家）说过有，才算有。比方说，古罗马的奥古斯丁教父曾经否认有新大陆存在，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北美洲一笔勾销呢？”

中年教士一听这话，自以为抓住了把柄，马上咄咄逼人地问道：“既然教父的话不是真理的标准，那么请问什么才是真理的标准呢？”

只听康帕内拉高声答道：

“自然界是真理的标准！只有自然界才是真正的权威，只有自然界本身才是认识的源泉！”

在那个以教父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时代，说出这番话，无异是晴天一个霹雳。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那中年教士也被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康帕内拉辩赢了。一直到晚上，科森萨市的许多人还在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个小伙子只要不被早早地烧死，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

## 铁窗里的斗士

康帕内拉只不过参加了一次辩论会，怎么就会被人烧死呢？科森萨人有点儿信口开河、言过其实吧？

话可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在十五六世纪的意大利，天主教的势力还大得很呢！他们为维护行将崩溃的封建统治，经常把一些反对封建主的造反者、进步的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抓起来，秘密审讯，严刑拷打，甚至处死。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只比康帕内拉大二十岁），就是因为相信科学，坚持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便被教会活活烧死的。康帕内拉竟敢公开藐视天主教的神学家，能不被教会看成危险人物吗？

果然，几年以后，康帕内拉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有段时间，康帕内拉经常去一所修道院图书馆看书。一天，图书馆出了张布告，说这里的图书未经教皇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借阅，违者开除教籍。康帕内拉看着布告，不禁脱口说道：“为了这么点小事就要开除教籍，难道是要杀人吗？”这话刚一出口，他就被两名披着黑斗篷的罗马天主教廷的爪牙扭住胳膊，带走了。康帕内拉被关进了监狱，一年以后，才放了出来。

这以后没过几年，康帕内拉又被抓进牢房。不过，这次抓他的不是罗马的天主教廷，而是西班牙的侵略者。

原来，康帕内拉小时候，他的家乡就被西班牙的封建主占领了。在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到处是破烂的茅舍、瘦弱的牲口和荒芜的葡萄园。为了用死亡威胁不屈的人民，侵略者还在广场上竖起绞架，上面经常悬挂着意大利反抗者的尸体。

康帕内拉的心中，从小就燃起了仇恨西班牙侵略者的怒火。他痛恨天主教的专横，更不能容忍侵略者的暴虐。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渴望，使他投入了反抗封建统治者和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一五九八年，康帕内拉组织了一次武装起义，结果，由于叛徒出卖，遭到了失败，他也被捕了。

从此，康帕内拉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他先后蹲过五十处监狱，受过七次酷刑。在一次持续了四十个小时的刑讯中，康帕内拉被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接着又被扔进一个地窖里。狱卒们管这个地窖叫“鳄鱼坑”，里面阴暗潮湿，到处是老鼠和毒虫。一般人在里面，用不了几天，不被折磨死，精神也会被完全摧垮。可这一切丝毫没能动摇康帕内拉的坚强意志，他始终没有吐露起义的半点真情。

康帕内拉把自己比做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普罗米修斯。这位巨人盗出神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自己却受到了无情的惩罚，被锁在高加索的悬岩上。一只老鹰天天来啄食他的心肝。康帕内拉也决心为了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来，法庭因为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只好判处他无期徒刑。

### 《太阳城》是怎样问世的？

康帕内拉在狱中度过了整整二十七年。铁窗使他和人民远离，酷刑把他的身体摧残，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斗争。他拿起了新的武器——笔和纸，开始了新的战斗。他在狱中写出了一本又一本著作，还想办法偷偷送出牢房，为的是把真理告诉人们，给战友和同胞带来力量和希望。

这些著作中最有名的就是《太阳城》。这本世界闻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从写作到出版有一段很不平凡的经历。

年轻时候的康帕内拉，就很爱看莫尔的《乌托邦》。那个平等和幸福的社会，深深地吸引了他。建立一个消灭诡辩、伪善、残暴和贫富对立的公有制社会，成了康帕内拉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狱中长期的非人生活，使这位铁窗斗士日益向往美好的未来；牢房终年的阴森黑暗，更让他感到温暖的阳光可贵。一个光芒万丈的理想国

在康帕内拉心中诞生了。他管这个国家叫“太阳城”，希望它像太阳一样，无私地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

康帕内拉想象的“太阳城”耸立在一座高的小山上。一到那里，就看见在围绕城市的高大城墙上，画满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东西，有数学公式图表、有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矿石、山脉丘陵、江河湖海、雪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还有世界著名的历史人物、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肖像，以及介绍各国生产技术的图画。通过这种直观教学，少年儿童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增长了许多自然和社会知识；谁不愿意这样有趣而有效地学习呢？

一个有人享福、有人受苦的私有制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关心下一代成长的。“太阳城”能这样注重下一代的教育，想方设法把他们培养成人，就是因为在在那里废除了财产的私有制，实行了公有制。用康帕内拉的话来说，“‘太阳城’的人民都是富人，可同时又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公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私有财产；他们使用一切财富，却又不为自己的财富所奴役。”“太阳城”中甚至没有家庭，一切住宅、房间里的家具、床铺都是公有的，而且每隔半年就要调换一次。孩子们成了整个社会的宝贝。人们都懂得，只有下一代健康成长，“太阳城”才能前程似锦。

在“太阳城”还可以看到许多新鲜事，比如在那里，劳动成了绝顶光荣的事情！人间的一切财富，包括人类自身，都是劳动创造的。可是，千百年来，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劳动一直受到鄙视。我们中国，不也有一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话吗？康帕内拉生活的那个时代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太阳城”人人都热爱劳动，所有的工作都受到人们的尊重；不论是从事打铁、建筑这些最繁重的工作，还是做服务性的工作，像照顾病人、在厨房做饭，只要干得出色，就授予他光荣称号，在音乐声中给他戴上桂冠。

“太阳城”的理想之光，把康帕内拉的心照得通明透亮，他恨不得马上把想好的一切写出来。可是，要在狱中写书实在是太困难了。康帕内拉好不容易才从一个同情他的狱卒手里，弄到了纸、笔和墨水。他拖着受过重刑、尚未复原的身子，奋笔疾书，每写一个字都要忍受钻心的疼痛，付出惊人的毅力。最让他恼火的是，他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狱吏查监，稍不留心，写出的底稿就会被没收。后来，因为康帕内拉有病，父亲和弟弟被准许到狱中来照看他。这真叫康帕内拉喜出望外。他叫家人“望风”，自己加紧写起来。

写出书来，怎样送出去呢？这又多亏了一位在狱中做事的好心的女护士。她恰好住在康帕内拉牢房的上面。每天，康帕内拉把写好的手稿系在一根绳子上。女护士把它吊上楼，再送出监狱。这样，虽然康帕内拉还关在狱中，《太阳城》却已经由他的好友印成书，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开了。

《太阳城》说出了当时人们渴望消灭阶级和贫富不均的愿望。它也和《乌托邦》一样，作为一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杰作，三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当然，“太阳城”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就说那里的居民吧，身上落后的东西还不少呢！比如，他们还很迷信，还崇拜什么“太阳神”，相信什么“占星术”（靠着观察天上星辰运行来预言人事祸福

的一种巫术)，而且主张共产公妻。仅从这一点也能知道，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离科学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呢！

## 《塞瓦兰人的历史》

二三百年前，西欧的读者不是爱看《乌托邦》和《太阳城》那样的游记吗？作家们就纷纷来写。特别是在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法国，这种空想主义小说多得像雨后春笋，可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一本新小说——《塞瓦兰人的历史》出版了。它的作者名叫维拉斯，是个法国人。他也像莫尔和康帕内拉一样，叙述了一个海外奇岛上的公有制社会，可是写法有些不同。人们一下子就被小说中那些惊险的情节、爱情的故事和异国的情景吸引住了。《塞瓦兰人的历史》在法国成了一部畅销书，还很快被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和意大利文相继出版。三四十年后，十分生动有趣的世界名著《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先后问世（我们的不少读者也许读过《大人国和小人国》，那就是照《格列佛游记》改写的），可是，欧洲各国的许多读者对《塞瓦兰人的历史》的兴趣仍然有增无减，可见它是多么受人欢迎！

《塞瓦兰人的历史》的主人公叫西登，他很像那个充满冒险精神和旺盛求知欲的鲁滨逊，一心想到海外去领略奇邦异国的风光。小说的开头和《鲁滨逊漂流记》也差不多。西登坐着一条海船，从欧洲驶往南太平洋的巴达维亚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中途遇到了海上风暴，一船人险些被狂涛巨浪吞没。不过，西登比鲁滨逊走运得多。他的船最后搁浅在一个荒岛上。船上的人绝处逢生，遇到了几个自称塞瓦兰人的当地居民，不但受到了殷勤的款待，而且幸运地游览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国家。

这个国家叫塞瓦兰国。原先，这儿有两个过着原始生活的民族，主要靠狩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后来，有个叫塞瓦利斯的波斯人来到这个蛮荒之地。他把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的理想国家。“塞瓦兰人”和“塞瓦兰国”都是用塞瓦利斯的名字命名的，他自己就当了这个国家的总督。塞瓦兰人，很快地富裕起来，他们也不再使用货币，每个公民需要什么东西，就去向国家申请随时都能得到满足。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读者一看就会想到，塞瓦兰国多半是作者空想出来的。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原始社会要经过财产私有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进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哪能象塞瓦兰国，一下子就从原始社会进入到生产力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公有制社会呢？

只是描绘出未来公有制社会的一幅幅图景，却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不过，一代代空想家并不只是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他们也在不断地探索，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出新的设想，使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变得更加完善。《塞瓦兰人的历史》的作者维拉斯，也是这样做的。

十七世纪后半期，正是法国封建统治最黑暗的时期。那会儿，法国的国王叫路易十四，是个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朕（zhèn）即国家”，意思是说，我掌管国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死了以后，由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小国王上台时还不到六岁。

维拉斯对塞瓦兰国政治生活的推想和法国当年的现实，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塞瓦兰国，最高的统治者——总督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不能当一辈子，也不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往下传。当总督年老力衰的时候，就找最有能力担任这一工作的人，来接替自己。第一任总督塞瓦利斯首先做出了好榜样。他在七十岁上，把权力让给了别人。在新总督就职仪式上，塞瓦利斯对他说：

“昨天你还是我的臣民，明天你将成为我的统治者……要记住，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要牢牢记住下面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真正的国君的光荣，不在于他的王冠的灿烂，而在于他的人民的幸福。”

塞瓦利斯辞职以后，带领全家住到远离首都的农村中，过了十六年平民生活。他临死前，还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女要热爱祖国，大公无私，遵守法律，忠于职守。

像塞瓦利斯那种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民主精神，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啊！

维拉斯在路易十四统治的黑暗年月里，写出了这样一本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使人们至今仍能从中受到教益，也是很了不起的。

可是，人们不清楚维拉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令人信服的材料，可以告诉人们，维拉斯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受过莫尔的《乌托邦》的影响，在他的《塞瓦兰人的历史》中，一开头就提到了那本书。

## 不信上帝的神甫

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年月，法国还出了个空想家，名叫梅叶。

梅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中，是第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这么说来，梅叶以前的空想家还信神信鬼吗？是的，多少都信一些，就连他们向往的理想国中，人们也还信奉宗教呢！在乌托邦，人们信基督教；在太阳城和塞瓦兰国，大伙儿崇拜太阳神。这一点，也是莫尔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中的落后东西。不过，这也难怪他们。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天主教统治人们一千多年，宗教迷信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就是像莫尔那样追求真理的人，也很难不受影响。康帕内拉虽然怀疑过圣经，不承认上帝，可还是觉得，“太阳城”的居民应该有个神来供奉！

但是，既然宗教是骗人的，是维护反动统治、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迟早会有人起来揭穿它，批判它，帮助人们从宗教迷信下解放出来。

梅叶就是这样做的。

说起梅叶的经历，令人惊奇。他宣传无神论，攻击宗教的虚伪和封建统治的罪恶，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就是在天主教的教堂里。要知道，这位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偏偏当了一辈子天主教的神甫！

原来，梅叶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乡村纺织工人。他希望儿子长大当个神甫，就把年幼的梅叶送到教会学校念书。梅叶又是个听话的孩子，为了让父母高兴，他也就轻率地做了教徒。

梅叶二十六岁上，被派到一个小村子——埃特列平村去做神甫。刚

开始，他大概也像别的神甫那样，传教布道，十分尽职；据说，还得到一个天主教的称赞。可到后来，梅叶跟来教堂作祷告的农民接触得越多，他的心就越是不能平静：那时候，农民的日子实在太苦了！除了给封建领主送交钱、粮、鸡、鸭、牛、羊，还得向路易十四和天主教交纳各种苛捐杂税。路易十四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是出了名的。他经常派兵去侵略别的国家，结果弄得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于是，拼命加捐加税，敲骨吸髓地残酷压榨农民。农民冒严寒、顶烈日地辛劳一年，把捐税交完，自己却连黑面包也不够吃，常常得靠嚼草根、喝生水过活；有的农民穷得甚至没有房子住，只好像原始人那样，在山洞里过夜。

封建领主还变着法儿地让农民侍候他们。比如，夏夜蛙声四起，打扰了贵族老爷、太太小姐的清梦，农民就得整夜蹲在田头和水塘边轰赶青蛙，不让它们发出叫声。就这样，封建领主还嫌盘剥得不够；农民过桥，得向他们交通行捐，农民借他们的烘炉烤面包，到他们的酒坊酿酒，在他们的磨坊里磨面，也都得交钱，不知不觉又被剥了一层皮。那些年，又连遭天灾，穷人的日子更加悲惨；田地上长满荆棘，到处是饿死的人的尸骨，真是惨不忍睹啊！

可是，当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们走进教堂，寻求一点儿安慰的时候，满口仁义道德的神甫还要他们心甘情愿忍受压榨和苦难，说是只有这样，将来才能进入天国！上帝和神甫的心，是善良，还是残忍，不再是清楚没有了吗？

农民的悲惨生活，领主的残忍贪婪，神甫的卑鄙伪善，使梅叶再也不能容忍了。他终于跟封建领主和天主教公开冲突起来。他在教堂的讲坛上公开揭发封建领主的恶行，斥责他们对农民的残暴。封建领主哪能容得这个小小神甫的“无礼”举动。一状告到天主教那里，说梅叶玩忽职守，甚至违反惯例，在只供封建领主坐的席位后面，竟摆上让老百姓坐的板凳。

天主教和封建领主一个鼻孔出气，马上把梅叶叫来，让他当着领主的面，解释自己的行为。可是，梅叶不仅不为自己辩解，反而义愤填膺地宣读了事先写好的反对贵族阶层的演说。这下子，可把天主教惹翻了，下令把梅叶幽禁在宗教学校。

一个月以后，天主教才放梅叶回村，同时要他号召教徒们为封建领主祈祷。梅叶回到村里，却在布道的时候，当着封建领主的面说：“天主教自己就是封建领主。他们瞧不起乡村神甫，不听神甫的话；他们有耳朵，却只是为贵族老爷生的。我们请求上帝叫贵族老爷们回心转意，不再虐待农民，不再掠夺孤儿。”因为讲了这些话，梅叶自然又受到了天主教的谴责。

梅叶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他完全不信上帝，他认为神甫天天宣传的都是些“极其愚蠢的谬论和荒唐无稽的迷信”。他“痛恨，痛责，痛骂”那一套，却又抛弃不了神甫的职位。他要斥责天主教和封建领主的暴行，结果是屡遭迫害。但是，仇恨的怒火烧灼着梅叶的心，他所看到的真理之光，使他不能昏睡沉沉，麻木不仁，他开始写起书来。梅叶希望他写的书能使人们睁开眼睛，看到人间的不平和宗教的荒谬，了解世界上的真理。梅叶知道他生前要公开发表自己的著作，一定会遭到不幸，就把写的书取名为《遗书》，意思是把书留到他死以后，再让人们去看。

梅叶拼命写作，他的眼睛渐渐瞎了。他曾经写信对别人说：“丧失视力比丧失生命要痛苦得多……”据说，《遗书》写好以后，他曾经绝食，甚至连法国人人都爱喝的葡萄酒，他也不愿再喝一口，一心盼着早日离开人世。

梅叶是在一七二九年去世的。他在《遗书》的末尾这样写道：“这本书在它公开以后，一定会引起教士们和暴君们对我的愤怒和咆哮。”“……毫无疑问将会有人诽谤我、侮辱我，这只是因为我大胆说出了真话。让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判断就怎么判断，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些一点也不会使我苦恼了……”

### 说出真理的《遗书》

对于《遗书》的遭遇，梅叶只说中了一半。

他去世后一年，《遗书》的手稿就被人发现了。就像梅叶预料的那样，因为《遗书》说出了真理，统治者又恨又怕，千方百计不让它和读者见面。可是，在法国，要看这本书的却大有人在。

《遗书》的手抄本很快就问世了，在法国各地秘密流传，每册要卖到二百四十法郎，还不容易买到。后来，又有人把《遗书》摘要或改写出版了。这些版本也是秘密出售的。法国有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名叫伏尔泰。他在一七六三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他在巴黎亲眼看见一个驼背人，偷偷地出售《遗书》。卖书人十分机警，只把书卖给那些“胆子大的爱好者”，对于一般读者，是绝对不卖的。尽管卖书、看书的人都很小心，统治者还是嗅到了气味，几次下令焚毁《遗书》的各种版本。

当时法国的人们，无论是皇帝、领主，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一般老百姓，只要打开《遗书》一看，都会大吃一惊的。因为，梅叶在书中，把法国的统治阶级——上至路易十四、天主教会，下至贵族老爷、大小官吏骂了个痛快淋漓，揭露得体无完肤。

梅叶痛骂暴君路易十四，说没有哪个国王象他那样专横，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梅叶挖苦地说，人们都叫他“大路易十四”，这倒不是因为他建立了什么伟大的功绩，“而是由于他的大不义、大野蛮、大篡位、大破产，以及根据他的命令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在海洋和陆地上进行的大屠杀”。梅叶直截了当地痛斥路易十四：你谴责海盗的劫掠行为，可是海盗不过是小偷，“而你才是大盗，因为你不能满足上帝赐给你的王国，还想征服全世界”。

梅叶揭穿了宗教骗人的鬼话。他告诉人们，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也没有什么上帝。任何宗教都不是神创立的，而是那些凶狠毒辣的强盗和假仁假义的骗子手，为了欺骗和统治人民捏造出来的。

梅叶说，画家把那些魔鬼描绘得奇形怪状，丑恶异常，可那些贵族富豪、太太小姐比魔鬼还要凶恶万分。他们抢劫、折磨人民，使人民不幸。人们描绘的魔鬼只存在想象之中，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家伙却是真正的魔鬼，正是他们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梅叶号召人民齐心协力，起来革命，杀死暴君，解放自己。用神甫的肠子做绞索，绞死世界上一切手握大权的老爷，消灭那头戴王冠的人，

——这就是梅叶向人民提出的战斗口号！

梅叶说出了穷苦人心底的呼声！对暴君的仇恨，对教会的怀疑，以战斗求生存的渴望，多少年来深藏在人们心底，但是没什么人敢说，更没什么人敢做！梅叶却用白纸黑字把这一切写得那样清楚明白，那样震撼人心！不要说法国国王和他的大小喽罗，被吓得瑟瑟发抖，就是像伏尔泰那样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吓呆了。

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心想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当然也反对那些支持封建统治的教会。所以，伏尔泰特别欣赏《遗书》中揭发教会贪得无厌、假仁假义地对待人民的部分。他曾经说过，“这部《遗书》应该在一切正直人的口袋中都有一本。”《遗书》的一些摘要本或者改写本就是伏尔泰他们出版的。

但是，资产阶级也是剥削阶级，它们虽然要推翻封建统治，却要继续统治人民，他们害怕人民的觉悟，用伏尔泰的话说，“当庶民都开始思考的时候，那一切就都完了。”所以，伏尔泰等人在出版《遗书》的时候，就把梅叶对不平等社会的揭露和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制度的号召统统删去了。

伏尔泰一类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并不那么喜欢梅叶和他的《遗书》，因为梅叶不但是位反对宗教迷信的无神论者，一位反对封建专制的无畏战士，而且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看出私有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要反对的是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私有制社会，他所向往的是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公有制社会。

梅叶的《遗书》，在他死后一百三十五年，才由一个荷兰人按照原稿全部出版了，今天，在我们中国，也能读到它的中译本。

M\*\*\*\*\*是谁？

书可以焚毁，真理却消灭不了，人们心中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更是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住的。正当《遗书》的手抄本在法国秘密流传的时候，一七五三年，又一部名叫《巴齐里阿达》（意译为《浮岛的毁灭》）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问世了。作者没敢在书中写上自己的真名实姓，只是署名M\*\*\*\*\*。

可是，作者的谨慎似乎是多余的，这本书并没有像《遗书》那样被查禁和焚毁。也许是因为书中没有痛骂暴君的言词，也没有抨击教会的话语，也许是因为书中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格外使人爱读；它受到许多读者的公开欢迎，前后再版过两次。

让我们先来读读《巴齐里阿达》中的几个片断吧！

“在这个幸福的国土上住着一个民族”，他们“不知道万恶的私有制——这个其他世界的一切罪恶之母。他们认为大地是所有母亲的母亲，她对待自己的孩子毫无差别，首先向最饿的孩子敞开胸脯。在这里，人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土地丰收，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田地，这是我的黄牛，这是我的房屋”。

“这个幸福社会的基本生活规则是：任何人都不认为自己不应当劳动，同心协力使劳动变成有趣和轻松的活动。”“每当大地回春的时候，他们便高高兴兴地忙着耕种田地。被高尚的竞赛所鼓舞的人，即种地最多的人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他说，我的朋友，我实在高兴，我愿意为

大家做更多的、有益的工作。”

“神把它的全部恩赐物都放在一个宝库里：人们跑到这里来，把它打开，每个人从里面取其所需，看到别人得到的东西比自己多，也不会因此不平。渴得发慌的行人走到清泉旁边，看到一个比自己更渴的人，多喝了几杯令人爽快的泉水，也不会对此发生嫉妒。如果大家希望扩大这个宝泉，就会有许多人同心协力，毫不费事地把这项任务完成。”

透过这些田园诗般美妙情景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在那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为社会尽其所能，从社会取其所需。可是，当时在法国，竟然很少有人理解《巴齐里阿达》的内容。有人推崇它是一部“纯朴的寓言故事”，有人却攻击它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谬误的挑战面前，是不会沉默的。为了驳斥对《巴齐里阿达》的种种攻击和污蔑，为了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书中的思想，它的作者在一七五五年又出版了一本《自然法典》。

在《自然法典》里，作者不再用优美的文学语言，描绘理想世界的图景，而是为未来社会制定了一部法律，规定了它在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原则。早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有个叫温斯坦莱的空想家，就第一个采用这种形式，写了一本名叫《自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不过，《自然法典》比《自由法》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比如，《自然法典》的作者第一次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比较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未来社会应实行公有制，可是，每个人用来满足生活需要、用来享乐的物品除外。在这以前，莫尔和康帕内拉等空想家，总是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混为一谈，笼统地说什么“财产公有”。作者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看一个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关键在于工厂、土地和劳动工具这些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被压迫人民要想获得解放，首先也必须把地主、资本家霸占去的生产资料夺回来。人民掌握了生产资料，才能使衣食住行确有保障。

作者在《自然法典》里，也开始从理论上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学者总是把私有制说成是从来就有，而且要永世长存的东西。

《自然法典》的作者却针锋相对地告诉人们，人类最早的社会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人类经过私有制，最终还要建立起公有制社会，这不是幻想，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自然法典》出版以后，同样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人们纷纷打听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最初，一些人认为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狄德罗听说以后，也没有公开否认，这就更使人信以为真。只是到后来，有人要利用这一传说，陷害狄德罗，他的辩护律师才搜集了许多材料，证明《自然法典》的作者不是狄德罗，而叫摩莱里。

摩莱里，法文写作 Morelly。摩莱里在出版《巴齐里阿达》署名的时候，只用了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M，而用六个星花代表了其余六个字母。

人们虽然知道了 M<sup>\*\*\*\*\*</sup> 是谁，对他的生平活动却仍然知道得很少。摩莱里大约生在一七二一年（也有说一七二二年的），死在一七八一年；他出身平民，当过教师。关于自己的历史，这位十八世纪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给我们留下这么一点儿。

## 为“平等派密谋”献身

摩莱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可他那闪闪发光的思想照亮了许多人的心，鼓舞他们投身到争取人类美好未来的事业中去。

法国十八世纪平等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就是这许多人中间的一个。

摩莱里和巴贝夫相差不过五六十岁，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摩莱里去世的时候，法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国王路易十六还在台上。可是没过十年，路易十六就被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那年，巴贝夫还不满三十岁。

巴贝夫年轻的时候，就十分痛恨那些残酷压榨农民的贵族老爷，向往一个平等自由的新社会。为了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他阅读了许多哲学、史学、文学和科学著作。他特别爱读摩莱里写的《自然法典》。不过，他也一直以为这本书是狄德罗写的。在摩莱里的思想影响下，巴贝夫决心为人民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这是巴黎的一座城堡，也是一所囚禁政治犯的国家监狱。它在人们眼中，曾经是法国专制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被打开了，千百年来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消息传来，巴贝夫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马上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中。他带领农民抗捐抗税，创办报刊，为穷人伸张正义。老百姓拥护他，称他是“人民代言人”，资产阶级却把他看成眼中钉，先后两次把他关进监狱。

事实教育了巴贝夫。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富人的革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革命”。资产阶级和贵族老爷一样，也是自己不干活，专靠榨取人民血汗来生活。人民在革命中，为自由、平等和幸福而战斗，结果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垫脚石”。

一七九五年十月，巴贝夫一出狱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他向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他组织大伙儿办报纸，出墙报，撒传单，唱歌子，宣传自己的革命理想。在巴贝夫向往的人人平等的共和国里，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再不会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会“诚诚恳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也都能享受到“丰衣足食的乐趣”。

巴贝夫不仅想，而且做。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去推翻私有制社会。他组织密谋，准备发动起义，建立新的共和国。把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是巴贝夫超出以往一切空想家的地方。

资产阶级政府越来越觉得，巴贝夫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他们派人查封了巴贝夫办的报纸，下令逮捕他。一天，警察所长带着一帮爪牙在巴黎市场上盯住了巴贝夫。那家伙以为巴贝夫毫无察觉，偷偷地挨了上去，想从背后一把抱住他。哪料到，巴贝夫早有准备，没等他动手，忽然闪电般转过身来，一拳把他打了个四脚朝天。市场上顿时乱成一片，

巴贝夫乘机在战友们掩护下，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资产阶级的镇压日益加紧，人民反抗的怒火也越烧越旺。“雷声响了，什么也阻挡不住暴风雨的来临。”为了发动起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革命者成立了以巴贝夫为首的“平等派密谋革命委员会”。

委员会在巴黎各区都派出了联络员和军事代表，并且在郊区工人群众和巴黎卫戍〔shù〕部队中建立了一些组织，以便在举行起义的时候，上下一齐行动，出其不意地夺取政权。巴贝夫提出，在起义成功以后，要用铁的手腕镇压敌人的反抗，立即剥本一切达官贵人的财产，没收他们的房屋、食物和衣服，无偿地平分给缺衣少食的穷人。

为了镇压平等派的斗争，资产阶级政府宣布处于“非常时期”，并且威胁要用死刑对付一切革命者。一七九六年五月的一天，巴贝夫和他的战友们正在一个裁缝家碰头，一伙警察突然闯了进来。巴贝夫他们措手不及，全都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事后才知道，是密谋组织里的一个叛徒出卖了他们。

巴黎郊区的工人听到巴贝夫被捕的消息，马上骚动起来。资产阶级政府不敢在巴黎公开审讯巴贝夫，便连夜悄悄地把押送到小城万多姆，交给那里的法院审判。

巴贝夫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勇敢地为自己的理想辩护。

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最尊敬的思想家是《自然法典》的作者，他是我的老师。”

法官问他赞成《自然法典》中的哪些思想。

巴贝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信奉关于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人人财富分配和社会地位上都应该完全平等的思想。”

巴贝夫庄严地宣布：“我要正大光明地维护我们的事业，这样，我才对得起法国的真诚朋友，才对得起自己……”

在每一次审讯中，巴贝夫都把法庭当成控诉统治者罪行，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讲坛。

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巴贝夫被判处死刑。他的战友，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去做苦役。

巴贝夫在法庭上听到判决以后，突然拿出一把刀子，要仿照古代英雄的作法，当场自杀。警察扑上来，夺走了刀子，可是巴贝夫已经身受重伤，鲜血浸透了他的衣衫，滴落在法庭上。

当天夜里，在就义前几个小时，他给妻子和孩子写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遗书。信中写道：

“我就要在永久的黑暗里长眠了。我不知道，在反革命将要展开的疯狂迫害之下，所有共和国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一直到母亲怀里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思想撕碎了我的心！”

“我是为了最伟大和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曾经多么爱你们。为了使你们幸福，我除了使所有的人幸福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我遗留给你们唯一的東西，就是我的美名。我知道，你们想起了我的美名，就会得到安慰。听到人家说，你的丈夫，你们的父亲，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一个高贵的、洁白无瑕的人，这对你们当然是很好的……”

第二天，巴贝夫挺着血迹斑斑的身躯，坦然地走上断头台。临刑前，他面无惧色，满怀信心地对在场的人们大声说道：

“我确信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们无罪，并为我们戴上桂冠！”

## “革命的接力棒”

像巴贝夫这样的革命者，真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抛弃个人的一切：名利、家庭甚至生命，献身于崇高的理想，献身于使千百万人争得幸福的事业。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懂得：什么叫品德高尚，怎样才算献身事业。

巴贝夫的战友邦纳罗蒂，也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邦纳罗蒂并不是法国人。他出生在意大利比萨市的一个贵族家庭。说起邦纳罗蒂的祖先，那可算是天下闻名。十四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了三位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我们的读者，一定听过他小时候画鸡蛋的故事）、拉斐尔，还有一位叫米开朗琪罗；邦纳罗蒂就是米开朗琪罗的后代。年轻的时候，邦纳罗蒂曾经在著名的比萨大学读书。（十七世纪的伟大天文学家伽利略，曾在这所大学教过书。）

虽说邦纳罗蒂是一位贵族子弟，他却把一生献给了法国人民的革命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事业。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刚一爆发，二十八岁的邦纳罗蒂就离开祖国，来到位于地中海上的法国属地科西嘉岛。他在那里创办了一张意大利文报纸，积极声援法国革命。科西嘉岛上的人们曾经呈请法国国民公会（法国革命以后建立的最高立法机构）授予邦纳罗蒂“法国公民”的称号，这是当时法国人民给予参加法国革命的外国人的一种最高荣誉。

虽然邦纳罗蒂尽心尽力为法国革命奔走出力，那些大权在握的资产阶级却容不得他。一七九四年年底，邦纳罗蒂被关进了监狱。就在这次囚禁中，它和巴贝夫相识了。积极参加革命的相似经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强烈追求，使他们俩一见如故。邦纳罗蒂接受了巴贝夫的革命思想，成为他忠实的战友。同时，他也用自己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给巴贝夫很大的帮助。

后来，邦纳罗蒂也参加了平等派密谋革命委员会，协助巴贝夫准备起义。由于叛徒出卖，巴贝夫和战友们再次被捕入狱，邦纳罗蒂也在其中。就在法庭宣判的前夕，邦纳罗蒂同巴贝夫相约，如果他能活着出狱，一定要把平等派运动的斗争历史，革命志士在万多姆法庭上受审的经过以及巴贝夫的社会主义思想，写成一本书公诸于世；为的是不让平等派运动被敌人玷污，为的是使巴贝夫的思想流传下去。

巴贝夫英勇就义以后，邦纳罗蒂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佩列岛去服苦役。三年以后，他又被押送到法国西海岸的奥勒龙岛。

这时候，那个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拿破仑已经发动政变，当上了法国最高的统治者。拿破仑后来还做了十来年的法国皇帝。不过，他这个皇帝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和封建时代的皇帝已经大不一样。所以，人们称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说起来，邦纳罗蒂和拿破仑还有些交情。他们两家是几代世交。邦纳罗蒂在法国大革命中，不是到过科西嘉岛吗？拿破仑的家就住在那岛上。一七八九年九月，拿破仑回科西嘉休假。一天晚上，他到邦纳罗蒂住的地方，和朋友畅谈起来。当时，拿破仑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

邦纳罗蒂却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他更像一个危险的野心家。俩人似乎越谈越不投机。不过，朋友终究是朋友。夜深了，他们就睡在一张床上，进入了梦乡，这倒真有点像中国一句成语说的：同床异梦。从此，他们俩分道扬镳〔bi o〕，邦纳罗蒂成了旧制度的破坏者，拿破仑却做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开路人。

可是，拿破仑一直没有忘记邦纳罗蒂，他上台后，就向邦纳罗蒂建议，只要他肯承认新政权，就放他出狱，并且安排他在政府里工作，却不料，被邦纳罗蒂严词拒绝了。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反倒要求拿破仑撤销当年万多姆法庭对他的不公正判决。这样，拿破仑一气之下，在一八二二年，亲自签署了把邦纳罗蒂放逐到厄尔巴岛的命令。不过，他对邦纳罗蒂的印象一直很好。后来他回忆起邦纳罗蒂，曾经这样写道：“他是一个聪明而博学的人，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虽说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恐怖分子，但是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坦率的人……他才能出众，既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和画家，又是一个技巧娴熟的钢琴家。”

邦纳罗蒂在拿破仑的眼中，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拿破仑却不懂得邦纳罗蒂真正伟大的地方，那就是：对自己献身的事业矢志不渝，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崇高的理想，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后来，邦纳罗蒂被释放回家。他一获得自由，就开始了新的战斗；他决心实现自己的诺言，为继承和宣传巴贝夫的思想，献出余生。他到处搜集平等派运动的重要文献，加上自己的回忆和思考，终于在一八二八年，也就是巴贝夫就义三十年以后，写成了一本宣传巴贝夫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书名叫做《为平等而密谋》。有人把这本书称为“一根革命的接力棒”，说它把十八世纪末法国共产主义的革命传统，传给了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革命家。

邦纳罗蒂的晚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生活得十分清苦。虽然那会儿，他的儿子在意大利非常富有，他却不曾向儿子要过分文接济。

一八三七年九月的一天，邦纳罗蒂在巴黎的一位友人家中病逝了。法国《国民报》上登了一条很短的讣告，称他的一生是“德行高洁的一生”。当时，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写了一篇沉痛悼念邦纳罗蒂的文章，赞扬他出身贵族，却献身法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法国皇帝拿破仑有私人友谊，却不向他求情；虽然有个腰缠万贯的儿子，自己却甘愿在异国过着清贫的生活。

安葬邦纳罗蒂那天，巴黎有一千五百人自动来参加葬礼。一个用橡树叶做的花圈，奉献在他的墓前，上面写着：“伟大的公民，‘平等’的友人邦纳罗蒂，人民授予你这个花冠；这件事将会受到历史和后代的赞许。”短短几行字，凝结着法国人民对这位意大利革命志士的深深的敬意。

## 《吕瓦尔旁尼》之谜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想当皇帝，哪怕只是挂个名，也不那么便当了。拿破仑一八四四年称帝，那会儿的声威是多么显赫，可也不不过是一枕黄粱美梦，到一八一五年，他就被赶下了台。

在拿破仑时代，虽然，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照样遭到禁止，可是，

传播真理的星星之火，依然在黑暗中燃烧，始终没有熄灭。一八一九年，又一本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在巴黎人民中间悄悄地流传开，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不过，那书很快就被拿破仑帝国的警察局发现了。他们查抄了小说，一把火把它烧了个精光。

这以后的六十多年间，人们只听说那本书有个令人不解的奇怪书名——《吕瓦尔旁尼》，却没有谁读过它，更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直到一八七五年，有人发现了一本作者保留过的样书，才揭开了《吕瓦尔旁尼》之谜。

原来，《吕瓦尔旁尼》是由法文“真正的幸福”这两个词儿颠倒拼成的。大概是作者怕人一眼看出他写书的真实意图，才用了这么个障眼法。

书的作者实际是两个人，一个叫比涅，一个叫斯蓬维尔。他们俩合写《吕瓦尔旁尼》的事儿，很值得说一说。

比涅和斯蓬维尔都是法国人，可他们不是在国内认识的。一七七九年，他们俩人一先一后到了俄国当时的京城圣彼得堡。在那里，他们相识了，并成了好朋友。俩人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是“人类为什么会遭到不幸？”这个问题始终在他们的头脑中盘旋，想丢也丢不开。

一八〇五年，比涅和斯蓬维尔都回到了法国。为了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求得最后答案，斯蓬维尔又找到了比涅，在他家中住了十五天。他们认真地想啊，坦率地谈啊，最后，由斯蓬维尔把双方都同意的看法记了下来。他们共同的结论是：私有制是使人类遭到不幸的根源。

斯蓬维尔回到家里，打算继续深入研究。不料，病魔突然袭来，他竟一病不起，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比涅失去了亲密的朋友，非常悲痛。他决心完成朋友的未竟之业，把他们认识到的真理传播开去。

比涅经过三年专心致志的研究，写出了《吕瓦尔旁尼》这本书，在一八一九年把它出版了。

《吕瓦尔旁尼》也是一本游记体裁的空想小说，说的是：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曾经到处充满着妒忌和仇恨、竞争和压迫。这一切甚至渗透到每个家庭里面。岛上最贫困、最不幸的，要算那些靠出卖自己劳动力谋生的人了……后来，一个叫破内南诺（作者用这个名字暗指拿破仑）的人登台执政。他连连发动对外战争；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人们对他笑脸相迎，可暗地里都十分不满。因为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幸福。作者在这里隐晦地指责拿破仑连年对外用兵，空耗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而不管人民的死活，流露出他对资产阶级在法国建立的新制度的不满。

那末，岛上人们的不幸是怎样结束的呢？作者异想天开地把希望寄托在那个破内南诺身上，说他后来终于认识到，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于是，他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的新社会。这样，岛上的人们就进入了“真正幸福”的境界……

《吕瓦尔旁尼》比起同时代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似乎没有多少出色的地方，书中也包含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作者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拿破仑这样的资产阶级人物身上，更是非常错误的。然而，我们毕竟可以通过这本书懂得：无论怎样黑暗的统治，都不能禁止人们去憧憬美好的未来，而美好的未来只有靠斗争才能得到。

否则，像《吕瓦尔旁尼》的作者，虽然为拿破仑说了许多好话，结果，连出版一本书的权利也得不到，更不要说建立什么新社会了。

严格说起来，《吕瓦尔旁尼》是比涅一人写成的，可他不忘斯蓬维尔付出的劳动和心血，为了纪念死去的好友，在书中也写上了斯蓬维尔的名字。这说明，他们两人的友谊是多么纯洁和高尚呀！

## “伟大的事业在等着您！”

下面就要讲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大空想家了。

也许少年读者听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吧？那其中之一就是法国社会主义，也就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所有的空想家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三个人的评价最高。恩格斯说他们“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还称赞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无数真理。

不过，少年读者如果现在就想弄明白三大空想家有那些高明的见解，他们的思想怎么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可不大容易。三大空想家不再像莫尔、康帕内拉那样，把描绘未来的图景，当成最重要的事儿；也不像摩莱里那样，一心要为将来的平等社会制定一部法律，而是更加深入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全面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详尽地设计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他们的学说讲到了许多理论问题，三言两语还真说不清哩！

那么，就让我们多讲讲他们的生平事迹吧！这些伟大智士的极不平凡的经历发人深省：一个人如果要为人类美好未来的实现做出贡献，应该具有多么坚定的信念，需要付出多么艰苦的劳动，必须抛弃多少个人的名利得失，做出多么巨大的牺牲啊！

先从圣西门说起。

圣西门和巴贝夫不但同岁，而且是同乡，可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大不一样。巴贝夫家里很穷，圣西门却是名门贵族的子弟。他父亲是伯爵，母亲是侯爵的小姐。

可是圣西门小时候，性格倔强得很，不大守家里的规矩。十三岁那年，按照一般贵族家庭的惯例，他该到教堂参加第一次领受圣餐的仪式，就是领一杯红葡萄酒和一块面饼，表示对上帝的虔诚。

父亲一再催圣西门去教堂，他却总不去，还说什么自己根本不信那一套。父亲气得大发雷霆，下令把圣西门关在巴黎的一座阴森可怕的监狱里。他满以为这准会让儿子驯服。可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圣西门没有半点儿悔悟，他竟然打倒狱卒，逃出了监狱。

圣西门十五岁上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却没有陶醉在荣华富贵的生活中。他吩咐仆人每天早晨叫他起床的时候，都要高声喊道：“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着您！”过了许多年，这喊声还依稀萦绕在他耳边，激励他前进。

一七七七年，圣西门满了十七岁，他也和别的贵族子弟一样照规矩去当兵。军营中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十分厌倦。他只能借读书来排遣心中的苦闷。

这时候，北美独立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北美原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一七七五年，那里的人民举行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美国这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就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

北美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斗，召唤圣西门奔向他少年时代向往的伟大事业。他主动申请到北美参战，而且声明不要任何薪俸，他说：“这种神圣的事业是不能用金钱来酬谢的”。

在北美两年，圣西门参加了五次战役。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特

别是在一七八一年围攻约克镇、迫使英国守军投降的那一仗中，圣西门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北美起义部队总司令华盛顿（他后来当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亲自授予他一枚共和国最高勋章。

一七八三年，圣西门回到法国。这时候，他已经晋升为上校了。可是，显赫的战功、荣耀的军衔并没有使他满足。他认为自己的使命不是当个军人，而是去研究“人类理性的运动，以便将来改进人类的文明”。北美的独立战争使他预感到，统治欧洲的封建制度就要分崩离析，一种新的进步的社会即将诞生。

圣西门怀着“为人类造福”的强烈愿望，放弃了高官厚禄，去周游欧洲各国。在这以前，他曾经到过墨西哥，向墨西哥总统建议在美洲中部（南北美洲原先是相连的一块大陆）开凿一条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沟通。可惜这项计划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完成。（一百多年以后，巴拿马人民开凿成了巴拿马运河，使圣西门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圣西门又先后去了荷兰和西班牙。他帮助西班牙政府筹备和组织开凿运河、修建海港，还打算建立一个公共马车公司。（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呢！）正当圣西门雄心勃勃地实行自己计划的时候，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圣西门关心祖国的命运，更向往平等、自由的新生活，便放下了刚刚开始的事业，匆匆赶回祖国。而就在这个时候，许多像他那样的贵族，却被起义的人民吓破了胆，正纷纷逃出国。

圣西门在法国革命的高潮中急流勇进。他向群众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要求废除贵族和僧侣的一切特权，还公开声明放弃自己世袭“伯爵”的头衔，改称为公民“包诺姆”（法文，老百姓、庄稼人的意思）。当地居民拥护圣西门，选举他当市长和国民近卫队队长，他却拒绝了；他告诉大家，让他这样出身的人，担任这种职务是危险的。想当初，圣西门叫人喊他伯爵，很是得意；可如今，他觉得贵族出身与革命不能相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圣西门变了样！

变是变了，可他还带着有钱人的味儿。圣西门虽然同情无数穷人的命运，却不满意他们用革命的暴力来对付自己的敌人；他看到连国王也成了起义者的刀下鬼，终于退出了革命的洪流。就在巴贝夫组织和领导平等派运动的时候，圣西门竟然和一个叫列德伦的外国人合伙，做起投机买卖来了！那个外国人出钱，圣西门经营。没想到，圣西门干这行当真有两下子，没过多久，他手中的钱就翻了几番，成了百万富翁。

然而，发财致富就是圣西门心目中的伟大事业吗？

### 为全人类创造幸福

虽说法国大革命使像圣西门这样的贵族世家都破了产，他们不能再过从前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享乐的日子，可圣西门作投机生意，并不是为了继续过豪华的生活，而是为了拿钱“去购买知识”。

圣西门的确是这样做。他认为，要“造福人类”就得有知识，就得去接近教授、学者和科学家。于是，他一面作买卖，一面经常在自己的客厅里准备好丰盛的宴席，用上等的美酒款待那些有学问的人，以便当面向他们请教。他还常常慷慨地资助一些贫穷的或者初出茅庐的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出版学术著作。

这么一来，人们到处都在议论圣西门挥金如土，大宴宾客的事。这一消息也传到了那个唯利是图的合伙人列德伦的耳中，他唯恐圣西门把自己的那份产业花光，就急忙从国外赶回巴黎。他坚决要同圣西门散伙，还玩弄诡计，把大部分财产攫为己有，只分给了圣西门其中的二十分之一，大约有十几万法郎。

圣西门倒没有和列德伦怎么计较，他早就不想做投机买卖了。为了开辟出一条使人类幸福的新路，他打算先专心致志地把自然科学搞个明白。他照旧在家里盛情招待那些学者名流，只不过没有从前那样的排场。他还经常去学校听名教授讲课，到图书馆看书。为了求学，圣西门几次搬家。先在工业大学附近住了三年，学习物理和数学；又搬到医学院旁边，去听生物学方面的课程。他还到过日内瓦，游历了英国和德国，考察那些国家科学研究的状况和发展趋势。

经过五年奋发努力，圣西门成为当时最博学的人，可他从列德伦那里分到的十几万法郎，已经花得分文不剩了。他曾经热情款待过的朋友，这时候都不再登门，甚至对他一封封请求帮助的告急信也置之不理。到这会儿，圣西门才真正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

圣西门只得去一家当铺当缮写员。他一天到晚，手不停笔地抄写，一年的收入总共才一千法郎，刚够他勉强糊口。就是在这样困苦恶劣的环境里，四十二岁的圣西门开始著书立说了。他只能在晚上写作，桌旁昏暗的灯光常常亮到天明。过度的劳累毁坏了圣西门的健康，他咳血了。但是，疾病没有使他放下手中的笔。

一八 三年，他的第一部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匿名发表了。

几年以后，贫困不堪的圣西门偶然遇见了过去的仆人迪亚尔。这位好心正直的人非常同情他的遭遇，慷慨地说：“先生，请到我家去住吧。我还有一笔小小的积蓄。您可以随便利用我的一切，您愿意怎样工作就怎样工作，这只是为了您从前待我的好处，对您表示我的一点感激之情。”圣西门紧紧拥抱了迪亚尔，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迪亚尔舒适、温暖的家中，圣西门能够平静地写作了。他用了三年时间，又写成了一本书，并且用迪亚尔的钱在一八 八年出版了。

可是，两年以后迪亚尔因病去世，圣西门又无家可归了。后来，靠几位远亲的接济，圣西门才在巴黎租了一间小房子，总算有了安身之处。可日子过得还是很苦：隆冬时节，他没钱买煤，屋里的炉火熄灭了，冷得像冰窖；一天的食物，经常“只有开水和面包”。为了请人抄写著作，圣西门把凡是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

可是，这位空想家依旧充满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当时这样写道：“我的生活每况愈下，但是生活的下降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我不仅没有跌倒，反而始终斗志昂扬。……我将近五十岁了，已到风烛残年，然而我才刚刚走上真正的生活道路。”

圣西门在度过二三十年的艰辛岁月以后，由一个贵族变成了穷人，由一名军人变成了学者，由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变成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伟大的事业，那就是为工人阶级和人类的幸福，去构想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他的信心和力量来自何处？就是来自他对科学和历史的广泛了解，对工人阶级和贫苦人们的深切同

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比憎恶，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强烈向往。在圣西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他写了许多重要著作。

这些著作的价值是巨大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他的思想包含了许多真理的萌芽。

比如，圣西门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每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的写照”，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

少年读者在学习社会发展史或者上政治课的时候，也许听过、读过有关类似的话，那大可不必奇怪。因为我们看的书，老师讲的课，有许多内容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圣西门，还有傅立叶和欧文曾经预示了许多后来被科学社会主义所证明的真理。

圣西门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可他的思想里也有很可笑的地方。他期望建立一个“一切人都要劳动”，一切特权都要铲除，人人都将得到幸福的社会。却把这个希望也寄托在法国皇帝拿破仑身上。他曾经写信向拿破仑呼吁，劝他放弃称霸欧洲的计划，和自己一道去建设一个新社会。据说，拿破仑收到这封信后说，写信的人一定是个疯子。的确，只有想入非非的人，才会劝皇帝摘下王冠，去做平民百姓！

圣西门晚年的境遇稍好一些，生活比较安定了，也有了几个学生。

一八二五年四月，圣西门逝世前一个月，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发表了。在这本书里，圣西门宣告他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书出版的第二天，圣西门忽然病倒了。五月十九日，他的病情加剧。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用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对守护在床前的学生们说：“我的一生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目的就是要为全人类创造幸福……为了要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就需要有顽强的精神……现在，果子已经成熟，只等你们去采摘……”

说完这番话，他才慢慢闭上双眼。

### 不愿继承父业的老实人

三大空想家中，有两位法国人，一位是圣西门，另一位就是傅立叶。

傅立叶比圣西门小十二岁。他父亲是一家呢绒商店的老板，虽然学识不高，却善于经商理财。傅立叶母亲的家里也是作买卖的。他舅舅是个大富商，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个贵族头衔来摆摆威风。

在那个人剥削人的社会里，谁要是不坑人、骗人，就很难发财致富。傅立叶的父亲也不例外。令人纳闷的是，生活在那样阴险欺诈、唯利是图的环境中，傅立叶却是一个十分诚实、富有同情心的孩子。

傅立叶从小就很可怜亲友中那些不幸的人们和沿街乞讨的穷人。他常常把自己的早点，悄悄送给来要饭的人。

傅立叶六七岁上，有一天，跟人到父亲开的呢绒商店玩耍；恰巧看见一个伙计正在欺骗顾客。他赶紧跑上前去戳穿了骗局，没让顾客上当，可过后，这个老实的孩子却挨了父亲一顿痛打。这件事给傅立叶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对别人说，他在童年时代，有时候因为正直，不想说谎作假而吃苦头，而他咒骂商业的欺诈的罪恶，就是从七岁那年开始的。

上中学时，傅立叶的成绩很好，而且兴趣十分广泛。他努力钻研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学，还喜欢上地理课，常省下零用钱，去买各种地图。他对音乐、诗歌和绘画也十分爱好。傅立叶会好几种乐器，还能作曲。在吉他伴奏下，放声高歌，是最让他开心的事。他写过诗，画也画得不错，真称得上是一个多才多艺、富有情趣的少年！他的房间里总是摆着许多鲜花，这成了他终生不变的习惯。据说，傅立叶从小就羡慕军队中严格的生活制度，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在大街上前进常引得他跟在后面观看。

然而，傅立叶却不能从他的爱好中选择一样，作为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因为按照当时商人的传统，他作为独子，必须继承父业。家里要让他商业上出人头地，飞黄腾达。

老傅立叶可算是一个狡猾的商人，他大概怕日后儿子会自行其是，便在临死前（那年，傅立叶刚刚九岁）立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分成三份，如果傅立叶经商到二十岁，可以得到其中的一份；如果继续干下去，并且结了婚，二十五岁的时候，可以得到第二份；然后到三十岁，才能拿到全部财产。这个老谋深算的商人，在死后，还继续用“巧妙”的遗产继承法强迫儿子服从自己的意志。

中学毕业后，傅立叶很想到军事工程学校深造，将来当一个军事工程师。母亲却不同意。在革命前的法国，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这种学校。虽然有钱人可以买贵族头衔，可家里哪肯为傅立叶花这笔钱！他们硬是把傅立叶送到商人那里学生意。他曾经逃跑过两次，但是最后终于屈服了。

这以后，傅立叶一直在里昂经商。里昂是当时法国仅次于巴黎的一个大城市，这里的资本家和商人最集中，工人也最多。虽然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可仍然到处是豪富和贫困的对立。资本家取代了贵族老爷，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却继续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里昂的织布工人总是天不亮起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天有十七八个小时不能离开织布机，工资却少得可怜。维持他们生命的是十分微薄食物，繁重的劳动使他们过早地衰老和死亡，人们甚至认为工人永远会断子绝孙。一个个病倒的工人，被送进医院。可他们在那里盼望的，不是赶快治好病，而是求得一服（fù）能马上摆脱人间悲惨生活的苦药。

苦役般的劳动、贫困、愚昧、卖淫、失业、饥饿，因为血汗耗尽而过早地死去，这就是里昂男女工人的命运。这一切深深地印刻在青年傅立叶的脑海中。

为了做生意，傅立叶在那些年里，经常去法国的一些城市，也到过英国、德国和荷兰。他在各处都亲眼看见了“商业的卑鄙龌龊”；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招摇撞骗的商人，采取种种无耻的手段，使老百姓陷入饥饿贫困，而自己却大发横财。从小就富于同情心的傅立叶，面对这一切怎能无动于衷？

虽然对这个黑暗的社会恨之入骨，傅立叶却无力摆脱那一切。一七

九二年，年满二十岁的傅立叶，得到了父亲的第一份遗产，就在里昂开了一家商店，也当上了商店老板。一年以后，他的买卖正做得顺手，一件意外的事情竟使他彻底破产了。不过，傅立叶并没觉得有多大的倒霉，反而感到庆幸，因为他总算摆脱了那可憎的商人职业。

### 一个苹果的启示

但是，傅立叶仍旧没能从商业中逃脱出去。几年以后，他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去干他十分讨厌、却相当熟悉的旧行当。不过，他不再是老板，而成了那些老板的手下人；他先后做过会计员、出纳员、发行员和推销员。

据傅立叶自己说，就在他为资本家做生意的时候，一个苹果启发了他，促使他开始一项新的事业：研究社会的运动规律，寻找医治社会痼疾的药方。

有一次，傅立叶从外省来到巴黎，到一家饭馆吃饭。饭后，他买了一个苹果，竟花去了十四个苏（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之一）。这真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在外省，用这么多钱，可以买到一百多个一样大、一样好的苹果！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

从此，傅立叶就琢磨开这些几乎无人理会的问题。

他一面干着商业职员的繁重工作，一面深入研究，经过四五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苹果的不同价格，社会存在的种种罪恶，原来都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傅立叶把资本主义称做“颠倒世界”或者“社会地狱”。他说，这个制度“只是巧妙地掠夺穷人和使富人发财致富的组织”，富人是“坐在黄金上的阶级”，他们勾结在一起掠夺穷人。

傅立叶列举了资本主义商业的三十六种罪恶，其中有：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哄抬物价、重利盘剥、掺假掺杂、制造饥荒、危害健康、偷运走私、贩卖黑奴等等。

同样的苹果，价钱竟能相差一百多倍，都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搞的鬼。商人为了抬高物价，多赚钱，故意把商品囤积起来不卖；有时候因为存得太多，甚至得把商品毁掉。那会儿，八百万法国人没有面包吃，同时却有许多粮食被一把火烧光；二千五百万人喝不上葡萄酒，大批葡萄酒却被倒进臭水沟里。傅立叶用亲身的经历证明说：“我作为商店店员，曾经亲自领人干过这种可耻的勾当，有一次竟逼着人把二百万公斤大米抛到海里去”。

傅立叶还愤怒地揭露了资本家贩卖黑奴的罪恶：那些黑了心的商人，为了牟取高额利润，用海船把黑人从非洲偷运到美洲。中途一旦发现有人追捕，就把黑奴一对对地装进箱子，抛进大海；病得要死的黑奴，也常常像无用的商品那样被扔掉；有时候，眼看船只要被截获，商人就干脆把船上所有的黑奴统统毒死。被虐待的黑人痛苦得再也无法忍受。到后来，只要他们被带上甲板，就拚命地扑进大海，想赶紧了此一生，免得再在痛苦中煎熬。资本主义的巨大财富正是在黑人和广大劳动者的累累白骨上建立起来的。

傅立叶用他那支辛辣、幽默的笔，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

你争他夺、尔虞我诈的丑恶现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讽刺说：在那个万恶的社会里，医生盼看病人越多越好，病得越重越好，拖得时候越长越好；建筑师愿意每天都来场火灾，恨不得大火烧掉一条街、半个城才好哩；玻璃商渴望下场冰雹，把城里所有人家的玻璃窗砸个粉碎；裁缝和皮鞋匠则希望大家的衣服和皮鞋赶紧穿坏；律师呢，则希望人们天天打官司！到处都弥漫着普遍的利己主义和相互仇视的心理，一些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另一些人的痛苦之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法律还有很多精辟的批判。比如，他第一次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叫做“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是“虚伪的法律”，它让“坐在黄金上的阶级”享福，却让穷人永世受苦。它让盗窃国家巨款的富商逍遥法外，却把仅仅偷了一颗白菜的穷人送上绞架。大盗可以为所欲为，小偷却罪该万死，这就是所谓“文明制度”的法律！

这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多么深刻而又机智，真是嬉笑怒骂，妙趣横生，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恩格斯说得好：“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

仅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傅立叶并不满足，他还设想了一个称为“和谐制度”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组成了许多生产和消费的协作社——叫“法郎吉”（在希腊语里是“步兵队伍”的意思）。傅立叶要让他的协作社的组织，同军队一样严整！

每个“法郎吉”有一千六百多人，分成果园队、种菜队、木工队、纺织队等许多生产队。一个人在一天里，可以先后从事多种工种，一种工作最多只干两个小时。这样就把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了。

在“法郎吉”里，人们想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还经常开展劳动竞赛，在工作休息时组织联欢会，这就使得人们把劳动看成是一种娱乐和享受，生产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法郎吉”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组织得井井有条。大家住在一座能容纳一二千人的大厦里。傅立叶管这座大厦叫“法郎斯泰尔”。大厦的主楼中有食堂、交易所、教堂、电报局、图书馆和冬季花园等。大厦左边是工厂，右边是住宅和集会大厅。所有这些建筑物都由长廊联接起来；人们在里面来往，可以风雨无阻。

傅立叶以前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搞平均主义，就是说，既然实行公有制了，那就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对社会贡献大小，人人都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大锅饭”！可是傅立叶坚决反对这种平均主义。比如，他设想的大厦里的房间，就有大有小；设备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食品有山珍海味，也有粗茶淡饭。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收入多少，租用不同的住房，选吃不同的饭菜。

可是，傅立叶毕竟是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理想社会也有许多不合理的东西，比如，在“法郎吉”里，虽然按照劳动的繁简和个人能力的大小，实行公平的分配，可也允许资本家按自己的投资多少分取红利（实际上是一种剥削）！他想要富人和穷人在他的“法郎吉”里都得到好处，携手建设新社会。

一八三二年，傅立叶的门徒真的组织起一个“法郎吉”。因为没有征集到多少钱，“法郎吉”的规模比设想的小得多，只有一百五十人参加，而且出乎傅立叶的意外，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富人，几乎都是工人。在傅立叶的领导下，这个“法郎吉”存在了一年，就宣告解散了。傅立叶本来想通过自己的试验，向全世界指明改造社会的道路，可他的失败恰恰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靠一些和平试验，根本达不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 等不来白出钱的富翁

虽然，傅立叶在幻想的“法郎吉”新社会里，创造了宏伟的宫殿和漂亮的花坛；举办了热闹的庆祝会和盛大的检阅；描写了人们在集体生活中的欢乐和享受自由与美满爱情的幸福，可他自己直到晚年，依然过着清苦而孤独的生活。

年近花甲的傅立叶在巴黎定居下来后，住在一所公寓的五楼上。从楼下到楼上要爬一条狭窄而弯曲的楼梯，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摔得头破血流。屋内只有床铺、桌子、椅子等几件必不可少的家具。床上、桌上、地板上堆满了傅立叶写的手稿，这就是他的主要财产。房间里唯一的摆设是鲜花，一盆盆鲜花，把屋子点缀得像一个花房。就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体弱多病的傅立叶继续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理想的社会制度。年轻的时候，傅立叶没有圣西门那样的机会向学者名流求教，只能在干完一天繁重的工作以后，找来一些报纸、杂志和书籍阅读。他记性很好，读书又十分专心，很多看过的东西，都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后来，他写书的时候，常常凭记忆引证许多作家的文章。恶劣的学习条件使傅立叶不能经常读书，更谈不上系统的阅读。可是，他注意深入思考，善于理解书中主要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他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知识。

到了晚年，傅立叶更加勤于思索，常常因为陷入深思而显得精神恍惚。他每天从家里出来散步，不是忘了带手帕，就是忘了带本子，几乎总要跑回家两三次。他有时候在大街上边走边想得出神，不由得大声自言自语起来；或者马上掏出本子，记下自己想到的东西。一回到家，他就赶忙坐到桌前写起来，常常一直工作到深夜。

听起来，傅立叶这个老头似乎有些古怪，其实，他并不孤僻。他待人真挚而亲切，特别善于和别人聊天。在交谈中，他一会儿让人惊叹不已，一会儿又让人大笑不止，他自己却始终十分严肃。他少年时就富有的同情心，在晚年有增无减。他不愿麻烦人，却十分乐意帮助别人。

有一天，外面正下着大雨。傅立叶和一个朋友坐在家中聊天。朋友告诉他，有位当临时工的姑娘因为找

不到住在城外的姑妈，焦急万分。傅立叶一听这话，就坐不住了，他抓起帽子和雨伞，冒着大雨，跑出去帮那姑娘找姑妈。人找到了，可是，姑妈对自己侄女的命运漠不关心。傅立叶又写信给熟人，帮那姑娘找到工作，这才放了心。

还有一次，一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穷得实在过不下去了，想卖

掉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尊拿破仑小铜像。傅立叶立即拿出七十法郎，买下了小铜像。然后，又把原物留给了这位寡妇。傅立叶个人的生活向来是节俭的，可他帮助起别人却是这样的慷慨。

不能说傅立叶是位好好先生。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迁就人。在交谈的时候，他常常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管对方是否觉得难堪。

但是，在一件事情上，傅立叶真算是一位法国的“东郭先生”。他始终期望，有朝一日有个什么资本家能发善心，出钱帮他创办“法郎吉”，他答应每天十二点准时等候这位好心的富翁的光临。据说，傅立叶每天不管多忙，总要在中午赶回家，整整齐齐穿上蓝色的大礼服，围上一条白色的围巾，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耐心地等候。当然，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也没有等到一个肯白出钱的富翁找上门来。

傅立叶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可他总不肯请医生看病，也不要别人护理。只要他身体稍微能够支持得住，他就继续不停地写作。

一八三七年十月十日清晨，公寓的女看门人发现，傅立叶穿著整齐地伏在床边，可是已经一动也不动了。这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这样寂寞地离开了人世。

## 工厂主成了慈善家

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席卷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圣西门、傅立叶并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欧文，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出现的。

英国早在一六四一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个资本主义工场到处建立起来。不过，在这些工场里，主要还是靠手工生产。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纺织工人哈格里沃斯，设计和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纺纱机，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百倍。打从这儿起，英国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大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劳动，资本主义的大工厂逐步代替了手工业工场。世界上第一部纺纱机、织布机、第一台蒸汽机、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条铁路、第一艘汽船，都是在工业革命中诞生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的生产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创造出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物质财富。

照理说，机器的使用，减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又好又多的产品，工人的生活总该过得比从前好些了吧？事实恰恰相反。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利用机器更残酷地压榨工人。为资本家创造出无数财富的劳动者，陷入更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中。工厂主大量使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逼他们一天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纺织厂童工十二小时内要在机器旁来回走三十多公里。成年工人的工资不断下降。劳累、饥饿、疾病使得成人的寿命缩短，童工大批夭折。工业革命的恶果，不由得使人们想起英国当年“羊吃人”的惨象。资本主义每发展一步，都要给劳动者带来多少新的灾难啊！

就在大小资本家利用工业革命混水摸鱼、大发横财的时候，一位与众不同的二十九岁的工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他一心一意的竟不是怎样榨取工人血汗来发财致富，而是要在工业革命中进行一番试验，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既增加工厂主的财富，同时也要让工人的生活好起来！

工厂主竟然要为工人谋利益，听起来真是新鲜！可这毕竟是事实。这个工厂主不是别人，就是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欧文出身很穷苦，他父亲是个手艺人。他九岁就做了商店的学徒，一直到十八岁。

店员的艰苦生活磨炼了欧文的意志，长期刻苦的自学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当店员，和形形色色顾客的接触，更使他对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欧文觉得自己也能干一番事业了。他辞掉商店的工作，先和一个熟人合开了一家小工厂。第二年，欧文就自己办起工厂来，不过规模很小，只雇了三个工人。别看厂子小，在欧文的经营下，一年就赚了三百英镑。很快，欧文管理工厂的才能被一些资本家看中了。一个厂主请他去当有五百人的工厂经理。欧文一去，就按照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试验；没有多久，产品质量就有了很大提高，工厂的利润也增加了不少。从此，欧文善于经营的名声，逐渐在英国的资本家中传开了。那会儿，他才二十岁。

一八〇一年，二十九岁的欧文，到英国拉纳克这个地方，担任了一家大纱厂的经理，管理四个棉纺厂、一个村落和二千五百名工人。欧文

把这家工厂改名为新拉纳克棉纺厂，他的大规模试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欧文刚去“新拉纳克”棉纺厂时所看到的一切，和英国当时别的工厂没有什么两样：工人们每天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工资却少得可怜，还常常遭受监工的鞭打。他们住在终年不见阳光、潮湿肮脏的工棚里；伙食更是糟糕，而且根本吃不饱。工人中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破产的手工业者，有流浪汉和乞丐，还有从孤儿院来的儿童。在苦难的重压下，这些人早就对生活丧失了信心，下工以后，不是酗酒、赌博，就是偷窃、斗殴。

那会儿，欧文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切是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恶果，他只是认为：人的性格好坏，不是天生的，主要是受环境影响形成的。有些人的品质恶劣，过错也不在他个人，而在于培养人的环境有缺陷。因此，要使人有所改变，首先要改变周围环境。

于是，欧文把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到十小时半，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一八六六年，工厂因为短缺棉花被迫停工四个月，他照样每月发给工人工资。他为工人修建了新的住宅，向工人宣传讲卫生，爱清洁；还设立了工厂商店，工人可以从这儿买到比较便宜的衣服和食品，不再受商人的盘剥；他还设立了公共厨房和食堂，减轻工人的家务劳动；举办了工人互助储金会、保险部和医院等等。欧文还取消了对工人的惩罚制度，改用说服教育的方法。

欧文不仅为工人，更为他们的孩子着想。他为孩子们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和模范学校，请来有知识、有耐性、喜欢孩子的人当教师。欧文要求不让儿童们死记硬背，而要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引起他们对各种事物的兴趣。在欧文办的幼儿园里，老师们通过游戏来教育孩子，孩子们一开始就感到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两岁的孩子就学跳舞，四岁以上的孩子开始学习唱歌。老师在亲切友好的聊天中，回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帮助他们认识周围的事物。幼儿园还教育孩子不要欺负自己的小朋友，而要互爱互助，使大家都和睦愉快。欧文一心要把工人的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诚实、勤奋、用心、爱清洁、讲节制，有强烈求知欲的一代新人。

欧文进行这些改革，看来得花不少钱，兴许会使工厂的利润减少吧？结果恰恰相反，由于工人对改革越来越感到愉快和满意，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厂产值反而增加了一倍多，给厂主们带来了更多的利润。“新拉纳克”工人区也变成了一个“模范移民区”。在那里，警察和法官变得无事可做，工人们也不再需要什么人来可怜了。

欧文在“新拉纳克”棉纺厂改革的成功，轰动了欧洲。各国的达官贵人、王公大臣，形形色色的资产者和慈善家，都纷纷到“新拉纳克”参观、访问。当然，最多的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想探听欧文获得优厚利润的秘密。十年之间，去那里的人不下二万。欧文也博得了欧洲最有名望的“慈善家”的美名。

“真正坚强的人”

“新拉纳克”的改革，使欧文名扬天下，也使他的工人们心满意足。但是，欧文却不满足。

他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新拉纳克棉纺厂二千五百名工人创造的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要用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而这二千五百名工人消费的财富，比六十万人用去的少得多，这中间的差额跑到哪里去了呢？二千五百工人跟过去六十万工人干的活一样多，靠的是机器。可那机器，还有用机器制造的产品，还不都是由工人们创造出来的吗？工人们创造的财富应当属于工人自己，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可是资本家却把这一切做为利润占为己有。欧文实际上已经通过计算的方法懂得，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对工人的剥削。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虽然“新拉纳克”的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他们的地位没有改变，仍然是他这个工厂主的奴隶。

劳动者劳而不获，剥削者不劳而获；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本可以用来消除贫困和落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依然充满了无知、贫苦、疾病、不和睦和犯罪。欧文终于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由可恶的私有制造成。私有制把富人变成“衣冠禽兽”，使世界成为地狱。

欧文曾经是一个资本家，他的经历使他懂得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可是他不想利用这个秘密发财致富。相反，他坚决主张取消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样，欧文就由一个慈善家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

当欧文还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处处受到英国有钱人的尊敬和欢迎，甚至连王公贵族都愿意听他讲话。然而，在欧文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资产阶级、反动僧侣和政府官员开始攻击和迫害他，把他从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中赶了出去；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也遭到了报刊的封锁。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欧文的信念。他一面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理论，一面开始了新的实验。

一八二四年，欧文不顾妻批信徒，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买了三万英亩的土地和一些房屋，建立了一个名叫“新和谐”的公社。欧文打算在公社内实行一种财产公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制度。在公社里，人人各尽所能，努力劳动。每个人既从事农业劳动，又从事工业劳动，还能搞科学研究。公社实行平等的按需分配。欧文也很重视公社儿童的教育，他提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欧文幻想通过他带头实验，先搞出一个模范公社，然后把他理想的公有制社会“从公社传到公社，从国家传到国家，从洲传到洲，最后遍及全球，对人们的子孙后代放出光芒，撒布芬香和富足、智慧和幸福”。

但是，结果呢？“新和谐”公社在惨淡经营了四年之后，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是因为“新和谐”公社处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社员的成份又很复杂，抱着各种目的来到这里，缺乏统一的思想；少数领导人光是指手画脚，不参加劳动；经营管理方面又缺少经验。最后，欧文只得用低价变卖了土地、房屋，结果损失了四万英镑（这几乎是欧文的全部财产）。

一八二八年，欧文把自己四个儿子留在美国，孤身一人返回英国。这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年过花甲了。欧文人老了，可他的心还是那样年轻，充满了活力。在美国的试验失败以后，他开始转向英国工人阶

级，到工人中间去活动。

欧文又先后进行了几次试验：帮助工人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开办“劳动公平交换市场”。结果，也都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怎么能允许工人们联合起来，摆脱资本家的剥削，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幸福呢？

欧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共产主义的试验，虽然屡遭失败，却从未灰心丧气。这位被马克思誉为“真正坚强的人”，为宣传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工作到将近九十岁的高龄。一八五八年，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还曾到一个会上去作学术报告。

欧文的工作没有白费。他的关于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思想，平等劳动的义务和平等取得产品的权利的思想，以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的试验也从反面深刻地教育后人：通过和平途径来改造充满阶级压迫的社会，只是一种空想而已。

“谁有剑，谁就有面包！”

今天的青少年读者，看到傅立叶一心等待富翁发善心，欧文一厢情愿地进行和平改造社会的实验，会觉得他们实在有些糊涂。剥削阶级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在他们眼皮底下，出现一个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公有制社会呢？不靠剥削人、压迫人，他们又该怎么活下去呢？我们在前面所讲的许多事情：康帕内拉被囚禁，梅叶的遗书遭焚毁，摩莱里匿名出书，巴贝夫英勇就义……不都证明了这一点吗？可惜，这无数的事实并没有使欧文明白：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新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倒是和欧文同时代的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懂得了这一点。他坚决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并且亲身实践，为此英勇、顽强地奋斗了一生。法国工人把他也比作为了给人类带来光明而受尽折磨的天神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列宁则赞扬他是“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

这个人就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布朗基。

布朗基生活在法国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岁月。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参加了革命的秘密组织烧炭党，积极投入了反对统治者的斗争。在一八二七年的一次示威游行中，布朗基和同学们勇敢地走上街头，他在和军警的搏斗中，三次负伤：中了一颗子弹，还被砍了两刀。这是年轻的布朗基经受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布朗基在大学就显得性格刚强、才能过人，连他的哥哥（日落姆·布朗基，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感到惊奇。在一封家书中，他哥哥写道：“这个小伙子日后定会使世界震惊！”

当然，布朗基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革命家，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偶然的。他受到过很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影响。布朗基最先接受的是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不过，他一开始就反对那种和平改造社会的幻想。后来，他看了邦纳罗蒂写的《为平等而密谋》这本书，受到了很大启发。当年巴贝夫的革命主张，由邦纳罗蒂的这根“接力棒”传到了

布朗基的手中。他决心继承巴贝夫的战斗事业，为了广大无产者和穷人的解放，组织秘密团体，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

就在这时候，历史上著名的一八三一年里昂工人起义爆发了。工人们在自己战斗的旗帜上写着：“靠劳动而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起义者打败了政府军，占领了里昂市。反动政府惊恐万分，赶紧派来六万援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法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使布朗基受到很大鼓舞。一八三二年，布朗基因为参加了一个叫“人民之友社”的团体，被资产阶级政府逮捕了。法官在法庭上问布朗基的职业是什么，他骄傲地自称是“无产者”。法官反驳道：“这不是一个职业。”布朗基愤怒地反驳他：“怎么？这不是职业？这是三千万法国人的职业！他们靠劳动谋生而又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布朗基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地宣传革命，他说：在我面前的不是法官，而是资产阶级敌人。我们之间所进行的是一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战争。总有一天，原告和被告的地位将会颠倒过来。

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他们在起义宣言中庄严宣告：“我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是我国的幸福，是未来的保证。”起义者高喊着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战的口号，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一直坚持到第六天。

里昂工人的武装斗争震动了法国。虽然两次起义先后都失败了，可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

布朗基从里昂起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献身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信念更坚定了。工人们在起义中的团结一致、英勇不屈，使布朗基预见到斗争的前途：无产者必定胜利，私有制必然灭亡。他更加相信：没有武装斗争，不使用革命的暴力，就不会有革命的成功。请听他说得多么干脆，多么明确：“谁有剑，谁就有面包！有了武器，就会使人叩头；手无寸铁的人群，就会被驱散。法国竖着工人的刺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降临。”布朗基决心用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残暴统治，建立人民自治的共和国，用劳动者的协作制度代替私有制度。

在里昂起义被镇压下去的革命低潮时期，布朗基先后建立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等革命组织，积极准备新的武装斗争。

### “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

一八三九年初，“四季社”准备在巴黎举行起义，一举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参加这次起义的只有五百多人，由布朗基担任起义的总指挥。

五月二十日恰好是星期天，巴黎城里的许多警察休假，外出游玩去了。布朗基抓住这个机会，指挥起义者迅速攻占了市政厅和警察署。反动当局派来大批增援部队，包围了起义者。由于布朗基在起义前后没有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就靠那五百人，哪里抵挡得住成千敌人的反扑。起义很快被扼杀在血泊之中，大多数领导者被捕。布朗基也没能逃脱，最初被判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

少年读者可能要问，布朗基他们为什么不多动员一些群众参加起义呢？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还愁打不倒一小撮反动统治者吗？

布朗基却不这样认为。他虽然比圣西门、傅立叶高明得多，不像他们那样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可他觉得，革命就得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只有这些人先暴动成功，才能把广大群众吸引过来，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说到底，他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布朗基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组织密谋，策划武装起义。尽管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布朗基也不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他几乎半辈子（大约将近四十年）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可他始终坚持斗争，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布朗基为革命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人们赞美他是一个“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

从一八三九年开始，布朗基被囚禁在法国一所最恐怖的监狱里。

这所监狱建在一座悬崖峭壁上，四面是茫茫的大海。关押布朗基的牢房，只有三米长一米宽。冬天寒气逼人，夏天臭气熏天，室内毒虫、老鼠成群出没。犯人还常常遭到狱卒的无故拷打和侮辱。

一年的狱中生活，使布朗基的身体受到了很大摧残。这时候，又传来他的爱妻不幸去世的噩耗，这真让布朗基痛不欲生！但是，他很快就振作起来，又投入了狱中的斗争。他让来探监的母亲，偷偷带给他小锯、锉刀，准备越狱。为了逃出囚笼，布朗基和另外四个难友，足足准备了两年，可惜在最后关头被狱卒发现了。越狱不成，他们的处境更艰难了。

布朗基在狱中得了重病。反动当局为了收买人心，下令赦免他；其实是想破坏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威信。布朗基看穿了敌人的阴谋，断然拒绝赦免，继续留在狱中斗争。

一八四八年，法国新政府上台，把布朗基从监狱中放了出来。可是，当权者很快发现，布朗基对于他们同样是个大祸害。他们一时找不到迫害布朗基的借口，就指使人在报上造谣，说布朗基出卖过“家族社”和“四季社”的同志。面对敌人的阴谋，布朗基毫不畏缩，也在报上发表文章，痛斥敌人的无耻伎俩。他愤怒地写道：“反动派，你们为了除掉一个危险的对手，竟然如此不择手段，你们太卑鄙了！”

这年五月十五日，巴黎十五万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人们冲进了国民议会。布朗基站在议会的讲坛上，要求给工人面包和工作。资产阶级新政府派军队驱散了示威群众，逮捕了布朗基，判处他十年徒刑。

这一次，布朗基被送到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岛上去服刑。狱中的管理不太严。布朗基通过探监的亲友，弄来了一个大木偶，再给木偶穿上自己的衣服，按照平时习惯的姿势，把它摆在桌边，弄得管监的常常把木偶当成布朗基本人。

一天夜里，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布朗基用木偶迷惑住管监的，和一个难友逃出了监狱。他们在岛上奔跑了一夜，来到一个渔夫家里。布朗基给了渔夫一些钱，请他想办法送他们过海。没想到，那个渔夫却去向反动当局告了密。布朗基又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一八五九年八月，全国实行大赦，布朗基才被释放。他回到巴黎，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独生子。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已经成了一个资本家，而且与自己的思想是那样格格不入。儿子劝父亲放弃政治斗争，同他在巴黎共享安乐的生活。布朗基当然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妻子早已

去世，儿子又站到另一营垒中去了，失去亲人的布朗基是多么痛苦啊！可这并没有使他悲观失望，他相信在青年中会不断涌现出新的革命者。不久，布朗基又开始了重建革命组织的活动。

敌人对布朗基又恨又怕，到一八六一年初，又把他关进了监狱，并且使用各种刑罚，残酷地折磨他。到第三年，重病缠身的布朗基，被送进了医院，这倒成了他逃出监狱的好机会！一天晚上，他戴了一个淡黄色的假发套，扣上一顶宽沿帽，夹在一群来医院看望他的朋友中间，大摇大摆从警察面前走过，竟然没被发现。布朗基一出医院，就直奔车站，坐上火车，平安到达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一八七一年，布朗基返回巴黎，领导一支四千人的秘密武装举行起义，又遭到了失败。布朗基再次被捕，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建立了伟大的“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诞生了。这时候，巴黎公社的起义者，多么希望富有革命经验，又享有崇高威望的布朗基来领导他们的斗争啊！为了营救自己的领袖，巴黎公社曾经多次同敌人谈判，建议用公社扣留的七十四名重要人质来换取布朗基一个人。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敢答应，因为他们知道，放走布朗基，就等于给了公社一个打败自己的领袖。

在巴黎公社存在的一百多天里，布朗基被缺席选为公社委员和公社的名誉主席。

一八七九年大赦，布朗基再次获释出狱。这时候，他已经七十四岁了。

布朗基出狱的第二天，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给他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

“……一八四八年前，人们还沉缅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之中，您已经光荣地宣告了阶级斗争，今天，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您再次出来充当我们的旗手……始终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您的全部政治经历的马克思，希望有幸同您认识。”

布朗基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可惜他没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转变成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但是，布朗基对科学社会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极为敬重的。他读过他们的著作，还介绍给自己的同志和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一直十分关心布朗基的命运。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布朗基不顾七十五岁的高龄，在一次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是“反对资产阶级三色旗和保卫无产阶级红旗”。夜里，他突然中风。在同死神搏斗了五天以后，这位坚强不屈的革命家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布朗基的住处，想要最后再看一眼他的遗容。下葬的那一天，法国有十多人自发地组成送葬的行列。

四年后，巴黎工人自己凑钱，把一尊青铜做成的布朗基像，安置在他的墓上，用来寄托对这位革命家的永久哀思。

## “慈父”卡贝

像欧文那样，幻想用和平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行不通；像布朗基那样搞武装斗争，只依靠少数人的密谋，又屡遭失败。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怎样才能实现呢？和布朗基同时代的几位法国空想家都在探索这个问题。

他们有的拥护布朗基的主张。其中，著名的有德萨米和皮佑。德萨米被恩格斯称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者。他参加过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等革命组织。当资产阶级政府诬蔑布朗基是叛徒的时候，德萨米曾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德萨米还同皮佑一块儿，在工人中间活动，宣传他们的革命学说。皮佑后来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斗争，被捕后，死在狱中。

当时，也有赞成欧文那样搞和平试验的空想家，卡贝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七八八年，卡贝出生在一个木匠家中，比布朗基大七八岁。他也参加过烧炭党。这个政党最初是意大利的一个反抗拿破仑侵略的秘密组织，它的成员常常扮作烧炭工人，潜入意大利南部森林中的烧炭场举行集会，“烧炭党”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后来，这个组织在法国也出现了，目的是要推翻复辟的波旁封建王朝。烧炭党先后搞过几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到一八三一年，波旁王朝倒了台，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把大权抢到手。卡贝在新政府里作过官，还当上了参议院的议员。可他十分不满七月王朝的统治，办了一张《人民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大资产阶级政府。因此，他几次遭到控告。一八三五年，法庭判了他两年徒刑。卡贝不得不逃离祖国，渡海到了英国，在那里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

卡贝身在异国，心向法国人民。他抓紧时间研究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马布利（和摩莱里同时代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邦纳罗蒂和欧文等几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前辈们奋不顾身、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激励着卡贝。他写道，“我因为献身人民事业而受迫害的时间太长，深怕从此不可能再直接参与这一事业，所以下决心要像康帕内拉那样，利用流放的时间进行思考和研究，努力使自己能再做一点有益于同胞的事情”。

经过五年的研究，卡贝形成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一八三九年，布朗基领导“四季社”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就在这一年，卡贝回到法国。他决定不再走布朗基搞密谋的道路，而是开始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宣传。他认为，只要广大工人群众理解了的思想，就会跟着他去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

于是，卡贝写了一部名叫《伊加利亚旅行记》的游记小说。这本书描写了一个空想共产主义的国家。那里，原先也是贫富悬殊，到处充满了阶级斗争。后来，一个叫伊加尔的马车夫带领大伙儿进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暴虐的女王和首相，建立起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国家。人民为了表示对伊加利的尊敬，把国名改为“伊加利亚”。

《伊加利亚旅行记》在一八四一年一出版，就轰动开了，人们争着阅读这本给他们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小说。卡贝吸取了以前的空想社会主

义著作中的许多合理东西，使他笔下的未来社会更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更令人向往；卡贝采取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游记形式，把书写得通俗明白，引人入胜，比圣西门、傅立叶他们的著作好读得多，也好懂得多。这就使卡贝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把卡贝的理论称为“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尊称卡贝是“慈父”；《伊加利亚旅行记》则成了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圣经”。

一时间，在卡贝领导下，法国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共产主义的伊加利亚运动。信仰卡贝思想的人数达到五十多万，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卡贝又办起了《人民报》。报社在全国有三百多名通信员和宣传员，还有许多人经常从英国、西班牙、瑞士等国向它投稿。

伊加利亚运动震惊了法国的统治者。宣传共产主义，对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种威胁，这和布朗基搞密谋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一样可怕。统治者攻击卡贝的那劲头，和对布朗基的攻击一样疯狂。可是，卡贝毫不畏惧，他坚定地说：“怀着满腔热情准备献身于拯救自己兄弟的人，就应该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一切；因此，不论牺牲将是多大，我都决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困难，庄严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实现及其不断完善而奋斗终生。”

卡贝的决心是大的，可他走了一条行不通的路；他不搞布朗基式的少数人的密谋，面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是对的，可他还要走欧文、傅立叶的老路，幻想通过建立模范移民区的实验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一八四八年前后，正当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革命的时候，卡贝却号召人们跟他“奔赴北美”，“到伊加利亚去”，到那里建立“上帝及其正义的天国”。但是，久经阶级斗争考验的法国工人阶级，在事实的教育下，已经渐渐感到，卡贝搞的那种实验，纯粹是一种幻想。一八四八年，第一批跟着卡贝离开法国到北美去的人，只有几百名。他们在美国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到一八五六年，就因为意见分歧，矛盾重重而瓦解了。就在这一年，卡贝去世了。大概，移民区的破产，给了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很大的刺激；幻想的破灭，使他很快就离开了人间。

## “无产阶级的童鞋”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就没有多少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好讲了。从那以后，空想家当然还有，可称不上“伟大”的了。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法国里昂的工人起义、英国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中，发出了被压迫者的怒吼：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站起来的无产阶级渴望知道，他们的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可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们还在向群众宣传那一套幻想的图景和方案。就在这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出来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提出的种种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就是说，他们终于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必由之路。他们的理论不但增强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必胜的信

念，而且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努力地研究空想社会主义，他们对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学说，都重新进行过探讨和批判，并且在工人运动中一一加以检验，这才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和他们同时代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却不愿再前进一步，不愿抛弃自己的空想，接受科学的理论。这样，昔日的伟大空想家，就变成了渺小的落伍者，甚至革命的反对者。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叫魏特林。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位空想家在新的时代中，是怎样从伟大变成渺小的。

魏特林出生在一个穷苦的裁缝家里。他上小学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还得到裁缝店去当帮工。

小学毕业以后，魏特林当上了裁缝。当时德国的许多青年工人，都先要到德国各地，还有瑞士、法国逛上几年，再找个地方住下来当师傅。魏特林也不例外，他先是走遍了德国，又到了法国巴黎。在那里，他读了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也亲眼见到了法国各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八三八年，他写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出版了。他在这本书里指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暴力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他向无产阶级大声疾呼：“你们不要相信，通过你们同敌人和解会得到什么，你们的希望只在你们的宝剑上！”

一八四一年，魏特林从巴黎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在一家裁缝店里干活，日子过得也很苦：三个人合住一间房，连张桌子也没有，他只好用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当书桌。有时候，他穷得连买内衣、袜子、糖和乳酪的钱都没有。可魏特林始终生气勃勃地进行着革命活动。他在日内瓦湖畔所有的城镇都建立起共产主义的联合会，而且创办了名叫《年轻一代》的期刊。他的主要作者和读者都是工人。工人们都十分爱看《年轻一代》，恩格斯赞扬它说：“从一开始它就胜过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了卡贝慈父办的《人民报》。”

魏特林在办杂志的同时，还写完了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书写好了，他却没钱出版。这时候，有三百名工人拿出自己的钱，凑够了印刷费，使这本书在一八四二年底同读者见面了。魏特林在序言中写道：“他们为我劳动，我也为他们劳动……这本书并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们的作品，因为没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但是这个总结以后还会有重大的改进，因为在宇宙之间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魏特林这番话说得是多么真挚恳切。那时候，他是谦虚的，他懂得工人兄弟的情谊和力量。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受到了法国、瑞士和德国工人的热烈欢迎。德国的一位工人回忆说：“当时有很多工人都读过这本书。由于能弄到这本书的人并不多，我们就只能传阅。这本书我读过三次。于是，我才开始想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能变化的……”魏特林的书就是这样深刻地启发了工人的觉悟。

德国卓越的诗人海涅也说这本书是“德国共产主义者问答教科书”。马克思则称赞它是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把它比

喻成“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这是一个既生动，又有深刻含义的比喻：童鞋眼前虽小，却会随着孩子的茁壮成长而变大，前途实在未可限量。

可惜，魏特林并没有使那“巨大的童鞋”再变个样。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给魏特林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他得到了“德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的美名。统治者也开始注意这位到处宣传共产主义的危险人物了。一八四三年，瑞士当局逮捕了他，指责他为革命学说辩护，判了他六个月的徒刑。统治者的迫害没能阻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反而使魏特林在工人中间的名声更大了。一八四四年，当魏特林从瑞士来到伦敦的时候，英、法、德等国的工人把他作为“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和天才的领袖”来欢迎。

生活的穷困不曾使魏特林气馁，敌人的迫害也没能使他屈服，可那一阵又一阵的赞扬声，却使他飘飘然起来。他不再千方百计去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而把自己当成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认为自己口袋里装着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图纸。

其实，照魏特林的图纸，是建不成什么天堂的。因为，尽管他的学说对于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仍然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比如，他追求的公有制就是绝对平等，这还是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的幻想。他主张的“革命”和“暴力”，还是布朗基式的密谋。他认为，只要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暴动，人类就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更可笑的是，他还把共产主义和早期基督教等同起来，说他在基督教的圣经里找到了共产主义的依据。

但是，魏特林看不见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他忘了自己说过要继续“改进”理论的话。当他的著作受到一点儿批评的时候，他就怨天尤人，说这是因为他才能出众，受到别人的嫉妒。

一八四四年，魏特林给马克思去信，要求和他建立通信联系。马克思虽然不同意魏特林的主张，可是对这个工人出身的理论家十分关心，吸收他参加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经常和他通信，还多次同他诚恳地交谈，希望他抛弃错误观点。马克思还给魏特林不少物质的援助。可是，这种同志式的温暖感情，并没有使魏特林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魏特林妄自尊大，拒绝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他终于和马克思决裂了。

那是在一八四六年，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魏特林反对科学地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的纲领，要求出版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马克思抬起他那狮子般的头，责问道：“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魏特林被问得张口结舌，他语无伦次地为自己辩解。马克思接着指出，必须给工人以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用科学共产主义教育工人，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时候，恼羞成怒的魏特林竟然攻击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他们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说他们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是闭门造车。马克思再也忍不住了，他愤怒地说道：“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

魏特林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决裂以后，渐渐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据魏特林的一篇回忆文章说，一八四九年九、十月间，马克思和他

还见过一次面。马克思像老朋友那样邀请魏特林到自己的寓所中，同他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马克思问：“难道你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

魏特林回答：“读过。”

“那你也一定承认它吧？因为它是整个共产党提出的。”

“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除了认为它可以写得更好些外，对它没有更多的意见。”

这时候，马克思显得很不高兴，几乎要发火，但是很快又按捺住了。

从魏特林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直到最后还在努力争取他。但是魏特林自信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拯救世界。后来，他到美国住下来，还发表了一些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一八七一年，这位昔日的著名空想家，死在美国纽约。

## 更伟大的科学

到魏特林为止，我们的读者已经认识了十多位空想家，大概也从这些空想家的事迹中，看到了他们的许多伟大之处。

他们是一批无私无畏、献身人类幸福的开拓者。他们都怀着崇高的目的，要建设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使无产者和全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的，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他们是一批百折不挠、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者。在私有制的黑暗重压下，为了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反复的试验；虽然饱经挫折和失败，却仍然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一代代探索不止。正是依赖他们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后人才避免了重蹈他们的覆辙。

伟大的空想家们几乎个个都在乌托邦的荒原上辛勤耕耘了一生，可他们收获的并不是累累的果实，而是不结果的花朵，他们满怀着崇高的理想，却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正确道路。

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找到争得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更加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彻底的科学态度。他们亲自参加了革命的实践，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那些合理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发现了“剩余价值”，从这里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他们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伟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才不断取得胜利。如今，社会主义已经不只是人们心中的理想，也不只是写在书上的理论，而是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亿万人民正行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所以，我们说，比起那些伟大的空想家，更伟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现在，让我们告别历史老人，从几百年前空想家们艰苦探索的历程中，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中来吧！在这四五百年间，历史前进的步伐是多么迅速，世界面貌的变化又是多么巨大啊！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再也不用像空想家们那样在黑暗中摸索，白费气力地空想了。

但是，社会还要向前发展，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如果说，空想家们当年的有些思想和行动，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幼稚、可笑甚至是荒唐的，那么，在为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比那些空想家们想得更深更远些，做得更好些，不犯或少犯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呢？

应该说，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了做一个通晓客观规律，自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为了对人类美好的明天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让我们都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吧！

1984年3月

